



金融与发展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www.imf.org/fandd

2005年3月号

Ricupero 关于贸易恐惧的论述
能源安全，还是不安全？
“欧元区外”的一个国家
Rajan关于依据规则与相机抉择
的论述



恐惧
因素

是什么在支撑多哈？



MFICA2005001



金融与发展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www.imf.org/fandd

2005年3月号

Ricupero 关于贸易恐惧的论述
能源安全，还是不安全？
“欧元区外”的一个国家
Rajan关于依据规则与相机抉择
的论述



恐惧
因素

是什么在支撑多哈？



MFICA2005001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季刊,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Laura Wallace
主 编

Jeremy Clift
高级编辑

Camilla Andersen
Christine Ebrahim-zadeh
Jacqueline Irving
Conny Lotze
助理编辑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Lai Oy Louie
美术编辑

Lijun Li
Kelley McCollum
编务助理

Raghuram Rajan
特邀编辑
Graham Hache
高级顾问

编辑顾问
Francesco Caramazza
Adrienne Cheasty
Alfredo Cuevas
Paula De Masi
Domenico Fanizza
Andrew Feltenstein
Paul Hilbers
Mark Plant
Eswar Prasad
Thomas Richardson
Jerald Schiff
Arvind Subramanian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 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 (202)623-7430

传真: (202)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

翻印本刊文章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Telephone: (202)623-8300

Facsimile: (202)623-6149

Website: <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 88190915 88190916

传真: 88190916

邮政编码: 100036

网址: <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 ISSN 0256-2561



金融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季刊

2005年3月号·第42卷·第1期

特 辑

是什么在支撑多哈?

8 发现一种声音

消除发展中小国在世界贸易谈判中的恐惧心理

Hans Peter Lankes

10 为什么发展中小国应该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中?

*Rubens Ricupero、Faizel Ismail和Sok Siphana*的观点

14 让WTO更有助于发展

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

Bernard Hoekman

19 多哈辩论

贸易谈判的前景为何不明朗

Aaditya Mattoo和Arvind Subramanian

多哈回合谈判能取得的成就将远超过怀疑者的预期

William R. Cline

成功需要“宏伟构想”

Patrick A. Messerlin

26 优惠削减: 导致恐慌吗?

依赖于一些产品的一些脆弱经济体面临着贸易优惠削减的最大风险

Katerina Alexandraki

30 援助与调整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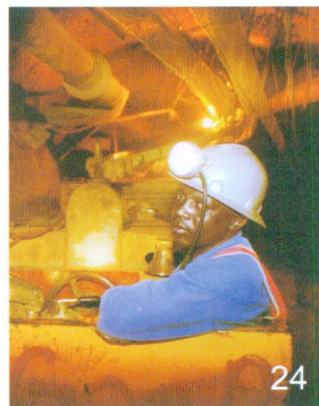
对于将会受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严重打击的少数国家来讲,特定的融资框架是必需的

Stephen Tokarick

34 如何通过更自由的贸易帮助摆脱贫困?

通过减少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减轻世界饥饿的议程

John Nash和Donald Mitchell



24



26



40

其 他

40 理解投资环境

关于企业的新数据资源
提供了有助于经济体成
长的见解

*Warrick Smith和Mary
Hallward-Driemeier*

- 4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正当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如何改革，以
应对影响全球经济的新力量
Vijay L. Kelkar、Praveen K. Chaudhry
和 *Marta Vanduzer-Snow*

其他内容

- 2 读者来信
阿马蒂亚·森——不同的观点
什么样的改革步伐最能奏效？
IMF也必须应对腐败
- 3 简讯
来自国际机构的消息
- 4 经济学人物
Camilla Andersen 对 *Bodil Nyboe Andersen*
的介绍
- 38 图表释义
能源安全，还是不安全？
- 44 返归基础
美元化：控制风险才是关键
Socorro Heysen
- 50 书评
世界的银行家：有关政府倒台、金融危机
和国富与国贫的故事，*Sebastian Mallaby*；
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
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创建，*Robert P.*
Bremner；
石油枯竭：处于危险新世界的边缘，
Paul Roberts
- 55 国家聚焦：欧元区
- 56 直言不讳
依据规则与相机抉择：在解决危机时，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度应该降低吗？
Raghuram Rajan

美术作品：封面和第 19 页，*Michael Gibbs*。

摄影作品：第 3 页，*Suzanne Plunkett/AP*；第 4 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 8 页，*Michael S. Yamashita/Corbis*；第 13 页，*Khem Sovannara/AFP*；第 14 页，*Paulo Whitaker/Reuters*；第 22 页，*Ricardo Azoury/Corbis*；第 24 页，*Charles O'Rear/Corbis*；第 27 页，*Antony Njuguna/Reuters*；第 30 页，*Getty Images*；第 34-35 页，*Antonio Mari/Zuma Press*；第 38-39 页，*Corbis*；第 40 页，*Dibyangshu Sarkar/AFP*；第 46 页、第 50-54 页和第 56 页，*IMF* 图片组。

担心过分吗？

围绕发展问题的一个战斗口号是贸易自由化——它和增加援助一样重要——它是帮助低收入国家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键问题。出于此原因，人们对 2001 年 11 月发起的多哈回合寄予较大的希望。世界银行一份研究中提出多哈贸易谈判如果成功的话，到 2015 年将会使 1.4 亿人摆脱贫穷。这一论断也常常被人们引用。

但在 3 年多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日益分裂为两个阵营，多哈回合几乎无所作为。对于以巴西、印度和南非为首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讲，列在首位的优先事项是在农业方面获得在富裕国家市场更大的准入机会，这是前几个贸易回合中没有解决的主要问题。对于多数较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讲，首要事项是获得特别待遇，包括免于履行许多新规则，以及得到确保给它们留有“政策空间”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承诺。这些国家担心更自由的贸易会使它们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因为其中的大多数已经在富国的市场中享受到了特殊的优惠。它们还担心承受不起实行新规则的负担。由于西雅图和坎昆的失利，这组国家更明显地感到它们不会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而且呼声也更为强烈。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和脆弱的国家对多哈回合的担心过分吗？本期《金融与发展》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观点”栏目中，我们请 *Rubens Ricuperio*（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前秘书长、*Faizel Ismail*（南非）和 *Sok Siphana*（柬埔寨）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小国应该参与到全球贸易体系中？我们也请几位贸易专家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发展中国家成为多哈回合的赢家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还回顾了 IMF 和世界银行的几篇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分析了贸易进一步自由化对较为贫困国家的影响，尤其在粮食安全、优惠削减以及粮食进口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这些研究报告表明，在广义的发展框架下，贸易自由化引起的任何一种负面结果看起来在较大程度上是可以控制的。由于脆弱性一般集中在具体国家和产品上，它们可以通过全球社会提供具有针对性的金融和技术援助加以解决。事实上，在贸易和发展方面采取这种措施的提议越来越多地被付诸实践，包括——正如世界银行的 *Bernard Hoekman* 所做的——要求多哈回合的赢家将其部分关税收入用于“再循环”。

最后，我们要向那些拨冗填写了读者调查的全世界读者表示感谢。调查的结果有助于我们将关注重点更集中地放在您感兴趣的问题上（要点见第 3 页）。您对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希望将鼓舞我们继续提高本刊的质量。

Laura Wallace
本刊主编



阿玛蒂亚·森——不同的观点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有关介绍阿玛蒂亚·森卓越才能的片段的文章（“自由促进发展”，《金融与发展》2004年9月号）。作为一名出自桑蒂尼克坦（森教授曾在这里从事研究工作）的印度经济学家，我对他的一言一行备感兴趣。同时，我也是森教授虔诚的景仰者，不仅是仰慕他的音容笑貌。事情总存在对立的一面——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缺点也是他的一部分。那么就让我来讲一点不同的观点吧。

尽管森教授确实是研究贫困和饥饿的先驱，但他不是提出正是无效的产权制度而不是可获得食品的减少引发了饥饿这一论断的第一人。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圣雄甘地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森教授将自由、民主和自由的媒体作为对抗穷国饥饿的药方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民主在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只是一种形式，而非事实上的存在，自由侵蚀着授权，媒体具有了党派性质，而且丧失了道德规范，某些有正义感的媒体除外。在许多穷国，政治统治处于自谋私利的政客的短期利益与和平的、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利益的冲突之中。

森教授将喀拉拉邦的社会成就作为典型来点评，但他很少提供，甚至没有提供走出目前喀拉拉邦式泥沼（大量失业、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但仍找不到工作、高死亡率、自毁性的消费主义、就业从农业部门向外转移的警报信号、“荷兰病”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

尽管森教授强调了土地改革在印度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指出像中国那样通过民主方式来获得财产所有权的必要性。

最后，该文不恰当地认为是森教授发现了衡量人类发展的科学创新手段。他只不过是不时地在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人本主义经济学间转移他的立场而已，而并不坚定地忠实于某一流派。

K. John Mammen

印度喀拉拉邦发展经济学家

什么样的改革步伐最能奏效？

我同意John McMillan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应该是渐进地、逐项地进行，而不能像Oleh Havrylyshyn主张的那样激进地、全方位地铺开（“改革：哪种速度最为适宜？”《金融与发展》2004年9月号）。McMillan的观点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促进增长和福利的改革方面的困难。

每一个改革战略都要服从其必然遇到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改革计划必须适合国情。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没有考虑到政治和管理体制上的差异，必然行不通。第二，改革计划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迭代和互动的逻辑过程。比如，不首先完成金融改革，任何推行私有化的尝试都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北非国家（后者程度较轻）——都处于GDP低增长、财政赤字飙升、结构性失业、外国直接投资极少、债务水平居高不下和贸易赤字积重难返的恶性经济怪圈中。向世界市场开放对于这些国家来讲于事无补，因为这只会在国际竞争面前加重它们社会和经济的脆弱性。

迄今为止，IMF根据减贫战略文件制定的方法也没能带来实际上的发展。IMF应该转而建立一项短期应急基金，该基金应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跳板来运作。但在长期内，必须对整个改革进程进行反思。

Hicham Houari

摩洛哥金融与私有化部部长

IMF也必须应对腐败

Cyrus Rustomjee（“发展中国家为何需要更强有力的声音？”《金融与发展》2004年9月号）恰当地观察了IMF减贫与增长基金5年运作的历史，包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遭遇的严重失误。在我自己的国家喀麦隆，失误一般来说肇始于劣质的治理，具体来说是腐败。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劣质治理大行其道，因为大多数国家没有法治。紧随其后的是政治长期不稳定，机构制度薄弱，这使腐败得以盛行，并带来预计风险。

如果不预先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做出改进，IMF在低收入国家的计划就不会取得成功。由于IMF在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们采取有效手段遏制腐败方面还没有表现出更大的决心，腐败现象不会消退。这种反腐败的压力由于不会削弱制度根基，它能促使这些国家提高透明度，而不是迫使政府按期公布其财政净值，或者将其国民预算管理公诸于众。这种方法已在乌干达试点，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尽管该国不是民主国家的典范。

Evariste Fopoussi Fotso

喀麦隆，杜阿拉

欢迎来信

欢迎读者来信！文章要求不超过300字。请发送电子邮件至：fanddletters@imf.org，或者致函本刊主编，Finance&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我们将对来信进行编辑。

亚洲海啸使灾害防治成为关注中心

2004年12月26日发生于印度洋的地震使20多万人罹难。这场地震再次引起人们对防灾减灾问题的关注。联合国官员讲,有近30万人口居住在飓风、洪水、风暴和海啸等灾害易发的沿海地区。今年1月在日本神户举行的世界减灾大会制定了一个行动框架,以帮助各国政府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

该框架鼓励各国政府:

- 识别风险并建立早期预警系统;
- 减少构成风险的因素,例如建筑质量低下等;
- 在灾害易发地区推进安全防范措施,推广有关知识;
- 加强灾害防治;
- 促进社区参与,培养灾害救治能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应对突发事件和减少自然灾害的风险方面更加有所作为,就能够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应该对防灾学校和医院给予特别关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2月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降低灾害风险:发展的挑战》称,1980—2000年,大约有150万人死于地震、火山爆发、热带风暴、旱灾和其他自然灾害。正如在印度洋海啸中一样,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承担了灾害带来的负担。援助官员认为,重建遭海啸蹂躏的地区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受灾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大约150万人失去了家园,估计损失在45亿美元上下,至少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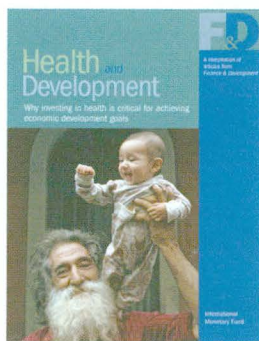
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的清理工作

同等数量的资金才能恢复家园。斯里兰卡的恢复和重建估计总融资需求为16亿美元,其邻国印度初步估计也需要15亿美元。泰国已经配置了16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而根据世界银行估计,马尔代夫的损失大约为5000万美元。

截止2月初,世界各国对灾害的援助承诺总额已经达到55亿美元。IMF提供了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并且正在帮助评估灾难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总的看来,海啸对该地区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受灾害打击严重地区的重建则需要若干年。与此同时,联合国官员力主现在就应做出计划,以将未来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

IMF 改善紧急援助条件

IMF 执董会决定向给予遭受自然灾害的低收入国家的紧急援助提供补贴。补贴将使紧急援助的利息从常规的与市场利率相联系的比率降至0.5%。这一降息措施使此类利息降到与冲突后援助的利息相同。新增的补贴预计将给IMF今后5年带来6800—9800万美元的成本。该成本将由新的双边捐赠支付。



新书问世:《金融与发展》有关卫生保健与发展的论文集最新出版,定价15美元,可通过IMF出版机构订购。

2005年即将发生的事件

4月16—17日,华盛顿特区,IMF与世界银行春季会议
5月4—5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9月14—16日,纽约,评估千年发展目标的联合国大会
9月25—26日,华盛顿特区,IMF与世界银行年会
11月16—18日,突尼斯,突尼斯城,信息社会世界峰会
12月13—18日,中国香港,WTO部长级会议

《金融与发展》的读者量

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一家公司Research Perspective最新的读者调查统计,《金融与发展》的印刷版至少有46万正式的读者,外加数千网络版读者。本刊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出版,印量达11万册,并出版了俄文网络版。据调

查,本杂志具有较高的传阅率,也就是说一本杂志拥有若干读者。60%的读者订阅本刊的时间至少在5年以上。有关经济的文章受阅率非常高。读者最喜欢看的是有关全球化、经济发展、减贫战略、金融与货币政策以及贸易等问题的文章。



“欧元区”外的

Camilla Andersen 对
丹麦中央银行行长
Bodil Nyboe Andersen 的访谈录

近一段时间丹麦中央银行大楼——一座由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Arne Jacobsen设计的漂亮大理石玻璃大厦——的走廊特别安静，这里过去并不总是这样。当Bodil Nyboe Andersen在1995年掌管中央银行时，她大概不很清楚将要面临的种种挑战。1997年，她不得不保护克朗（丹麦的货币单位）免受亚洲危机以及一年以后的俄罗斯危机的牵连。2000年，她又不得不去抚慰那些担心丹麦人投票否决采纳欧元（这是不到10年里的第二次）的货币市场人士。

不加入欧盟的经济与货币联盟（EMU）的决定，使丹麦处于欧元区的边缘。并使其蒙受了在经济政策上（对欧盟）施加影响的损失。在经历了所谓的“外围”国家的感受之后，Andersen更愿意看到这个决定得以修改。“我个人是赞成加入欧元区的，”她对《金融与发展》的记者说。“采纳欧元，与追求固定汇率政策的做法相比，可使经济政策的范围更宽广。我们将赢得对欧洲货币政策的一部分影响力，并在财政政策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

Andersen进入中央银行之前的职业，赋予了她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的宝贵经验，并使她具有了对私营财政运转的洞察力——这是管理一个已经取消一切资本限制的一个小币种时所需具备的两个重要素质。在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行长之前，她在学术界私立部门和政府之间很轻松地转换着不同的角色——这在人们往往只选择一种职业并一直干到老的国家（不像美国）里是不同寻常的。在哥本哈根大学担任了几年讲师之后，她成为一名私人银行家，这一职业使她最终于1990年被任命进入丹麦第二大银行（联合银行）的管理委员会。不到一年，她就调到丹麦中央银行的理事会，5年后成为其负责人。“这看起来可能是一种职业计划，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Andersen说。

一国货币管理

2004年, Andersen连续第7年被丹麦的一家主要商务杂志 *Borsens Nyhedsmagasin* 评为丹麦最有诚信的人。作为执掌中央银行最高职务的少数几位女性之一, 她于2000年被《环球金融》杂志列为全世界金融界最具影响力的20位女性之一。为此, IMF的执行董事会在2004年称赞丹麦经济具有“将一个很强盛的福利国家与高就业率和高增长率相结合”的能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04年的增长竞争指数, 丹麦失业率为6% (即使根据欧盟标准, 这已是很高的劳动就业率; 超过75%的成年人拥有工作), 政府债务为GDP的43% (欧元区的这一数字平均超过70%), 一个强有力的和可持续的预算盈余以及低于2%的通货膨胀率, 所有这些使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五大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

小国家, 大举措

1992年6月, 当丹麦政府为批准包含EMU蓝图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举行公民投票时, Andersen就预见到标志着她在中央银行任期的第一个10年的市场情形。投票的时间安排得太糟了, 反对放弃国家货币的力量在整个欧盟愈来愈壮大, 微弱的经济增长使许多国家达不到加入EMU的先决条件。尽管低利率可能起作用, 但加入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国家, 除了执行德国联邦银行的政策外, 别无选择 (而这一在德国统一以后做出的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 使汇率居高不下)。丹麦对单一货币的“不, 谢谢”的态度, 加重了即将来临的沮丧气氛。不安笼罩着货币市场, 各相关国家不得不再提高利率以保护其ERM平价机制。这种不安逐步扩大为一场全面的危机, 吞噬了ERM的大多数货币 (包括丹麦克朗)。这种危机的确是骇人的, Andersen说。有一个国家——英国——永远脱离了ERM, 而其他国家同意允许其货币在更大的幅度内波动。但是, 丹麦“在几年以后, 回复到以前的波动很小的幅度 (按旧的平价制) 而没有出现大问题。”

丹麦后来虽然追随了英国, 并被准予“选择退出”采纳欧元 (见专栏内的说明), 但政府就是否应当加入欧元区的问题, 于2000年再次举行公民投票, 纵然有各主要政党的支持, 丹麦人还是投了否决票。

这种重新激起的放弃欧元的情绪对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 等待投票的那段日子一定是令人心烦的, 结果也出乎中央银行所有忙着准备让丹麦加入欧元区的人士大失所望。但Andersen的反应很简短: “这个结果说明, 我们仍然能够施行我们采用了多年的货币政策。” 丹麦将汇率作为“名义锚”的传统做法, 可追溯至原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平价机制 (这一制度于1973年被废除)。据Andersen说, 这一政策有些时候运作很成功, 有些时候则不太成功。“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 稳健的汇率政策已成为丹麦经济政策的基石。”

逆势而为

然而, 将汇率钉住德国马克 (从1999年起钉住欧元) 的做法, 普遍不被看好。在墨西哥、亚洲、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的金融危机致使一个又一个的钉住汇率制度失败之后, IMF的立场转向所谓的“两极观点”。只有非常硬钉住汇率的做法或自由浮动货币才可能在对资本市场开放的国家里有持续性, 而且, 硬钉住的做法, 只有在得到满足紧缩银根要求的政策支持下, 才能得以维持。处于两者之间的体制, 则被认为易于遭受危机, 至少对于向资本流动开放的经济体是这样的。

这种观点在IMF半年一度的咨询会议上发展成为与丹麦之间的对话。据Andersen说, 将有代表团到访哥本哈根, 表示他们对丹麦中央银行钉住汇率 (德国马克/欧元) 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并且调查采取更具灵活性的做法或者成为EMU全员会员制的情况。然而, 每一次她和其同事都明确地表示“我们很愿意遵守游戏规则并做出必要牺牲”。有时, 在长时间的讨论之后, 双方互相达成谅解, 而IMF上世纪90年代期间的多份报告最后也都得出结论认为, 只要丹麦政府继续执行适当的支持性政策, 钉住汇率水平就是稳定的。

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Andersen强调说。IMF对钉住汇率有了更微妙的看法, 而丹麦经济与货币政策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自1999年欧元产生以来, 克朗对这一通用货币的比率一直保持稳定, 并在ERM2 (这是欧元诞生时取代ERM的汇率机制) 的极其有限的幅度内交易。IMF在其最近一次对丹麦经济的评估中, 称赞丹麦的固定汇率是宏观经济稳定战略的支柱, 并且说, 丹麦与欧元区汇率之间很小的差价, 证明了钉住汇率的可靠性。用Andersen的话说, “市场可以见证我们与欧元一样稳定。”

丹麦与欧盟的特殊关系

1992年丹麦投票否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几乎妨碍了该条约在欧盟的实施，因为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批准任何对欧盟宪章框架的更改。政府为了争取对欧元持怀疑态度的国人而很快举行的新一轮的公民投票——这一次政府承诺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争取到4项决定退出的权利，包括：

- **经济与货币联盟。**丹麦不需要采纳欧元。惟一享有这种决定退出权的另一个国家是英国，在1991年丹麦第一次公民投票之前，英国通过谈判取得了这一特殊地位。
- **联盟公民资格。**这方面的决定退出权已过时。
- **共同防御。**丹麦不需要参加具有防御意义的行动，包括欧盟的维和任务。
- **司法与内政。**丹麦不参与欧盟某些地区的司法合作，包括涉及移民与避难政策的决定。

Andersen是否把成功（至少是一部分）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和公众认为她必须说出的这种事实？毕竟，可靠性对中央银行行长的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Andersen不否认这一点，但她对克朗的稳定多多少少地与她的交际能力有关的说法嗤之以鼻。“我们的诚信与我担任行长无关，而是与中央银行和政府兑现了其承诺有关。年复一年地履行诺言而不改变初衷，正是诚信所以产生的原因。”

这种观点是有事实依据的。即，基于一种硬钉住的汇率机制是很透明的，一旦确立了其可信性之后，就不需要过多地做出解释。与以前通行的以货币供应为目标的政策相反，将汇率作为一种“名义锚”的做法，其成功与否是显而易见的：市场只要看看克朗与欧元之间的每日汇率即可。相反，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则需要进行很多的对外交流，因为这种做法是以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依据的。Andersen解释说，以汇率为基础的政策，“一旦确定了其可信性之后，就是一种很简易的机制，因为当市场预见到可能发生变动时，就将代替中央银行实施所谓的‘以稳定货币为目的的投机买卖’。”

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

当一个国家（就像丹麦那样）采取灵活的货币与汇率政策——即，在欧洲中央银行（ECB）的每一次汇率变动之后几小时内，紧跟着就是丹麦的类似动作——时，除了实施一种很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外，别无选择，以免市场对其中央银行将货币维持在现有水平的能力失

去信心。

丹麦也不例外。合理的财政政策对克朗的稳定已经起到关键作用，这个国家自1997年以来，一直保有预算盈余。这使政府1993年几乎高达GDP80%的负债降低到目前43%的低水平。Andersen把这种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承诺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次财政危机，在那个期间，“丹麦滑向了深渊，经历了一次顶级危机。”在那次危机之后，出现了一种政治上的默契，赞成财政统一。1997年，欧盟采纳了《稳定与发展公约》（SGP）。该协定要求每一个EMU成员将其年度财政赤字限制在GDP的3%之内，并在中期内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而且还举例说明，如果不能达到这些要求，将受到处罚。虽然只能对ERM成员国实施处罚，但所有欧盟国家都受到SGP中阐述的目标的约束。今天，在差不多一半的EMU成员国违反SGP的时候，丹麦却享受着国家财政1%—2%的盈余，远远低于该协定规定的幅度。并且有助于使其做好准备，应对老龄社会与劳动力的减少。

当被问及保持对欧元的稳定汇率的要求是否推动了财政稳定的问题时，Andersen说，很难说两者中哪一个起主导作用。“不能简单地说，是汇率政策促进了财政约束，实际上是财政约束使汇率政策成为可能。上世纪80年代采取的其他有胆识的创新政策，是使丹麦宏观经济框架结构发生转变的一揽子计划的全部内容，”她说。

鉴于丹麦在稳健的财政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功及其在保持稳定的汇率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人们也许不会对丹麦中央银行最近就是否放宽SGA要求的辩论中采取强硬态度的做法感到惊奇。Andersen和其中央银行同事还多次强调过他们反对使预算约束放宽的变化。“并非规则不可取，”她说，“而是没有很好地遵守规则。”

丹麦可以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给其他欧盟国家（特别是10个新成员国）以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吗？这些新成员国（包括两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丹麦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已经有几个加入了ERM2。其目的是一旦它们被证明能够至少保持货币稳定两年，它们就要采纳欧元。更多的国家（包括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计划很快加入。

尽管丹麦取得了成功，但Andersen对于把其国家树为别国榜样的做法仍然持谨慎态度。她指出丹麦与这些新成员国之间的许多差异，包括克朗只在大大低于新入ERM2的货币的波动幅度内波动的情况。但是，她说如果这些新成员国能够成功地超过丹麦，即确保财政政策可以巩固汇率机制的话，则另当别论。“它们不能在采用一种依赖货币政策并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机制来使经济稳定的同时，又让财政政策完成剩余的其他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她警告说。“这正是ERM2的整个理念，即在放弃一切货币主权而拥有一种通用货币之前，必须

表明其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能够保持稳定。”

不无风险的战略

如果这些新的ERM2成员国不听她的劝告，而使危机加速发生该怎么办？克朗会因受到牵连而被迫取消钉住汇率的做法吗（就像1993年发生的那样）？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Willem Buiter在最近的一份文件中说，一个成员国试图用ERM2来弥补国内政策缺点的任何尝试，都将遭遇像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发生的那种多层次的货币井喷式风险。他辩解说，如果不制定新的加入欧元区成员的规则，那么一个尚未准备好采纳欧元但却加入了ERM2的国家，就可能对其他欧盟国家造成伤害。

“年复一年地履行诺言而不 改变初衷，正是诚信所以 产生的原因”

Andersen当然不是不考虑危机与牵连的风险。“谁都不应当把话说绝，”她解释说，但同时又补充道，“我认为这对我们不是一个大问题。”她指出中央银行的高额储备以及关于ERM2（它把各种货币联成一个网）在结构上不同于ERM的事实。新的“放射式（轴-辐条）方法”意味着各种货币彼此之间不再直接相联，而只是与欧元相联，这是一种可降低牵连可能性的做法。她的抽屉里有没有放一份应急的计划？Andersen简短地说：“小心一点不为过。”

目前丹麦人有一种出口战略，即加入欧元。但在这一战略实施前，肯定要举行第三次公民投票。作为Andersen思想的一部分，她认为采用欧元将不仅会给丹麦的经济政策带来更大的灵活性，而且还能增加丹麦在ECB法兰克福总部决策中的发言权。

做一个“外围”国家的代价

当然，丹麦做出的留在EMU之外的决策，也有其内在的矛盾。投否决票的那些人之所以投否决票，是因为他们不想向布鲁塞尔出让更多的主权。然而，结果却是丹麦只能跟随ECB的每一次行动，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它。Andersen和其同事使用个人网络参与，或者至少被告知有关重要的政策发展状况。“幸运的是，中央银行有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已经做了许多年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个圈子里人很多，”她说。

如果你来自一个小国家，则网络联系不仅在欧洲层面，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很关键的。为此，Andersen作为IMF最高决策机构“行长委员会”的成员，与IMF之间的合作，也采用了同样的原则。“我们十分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是一个小国，而对方是一个国际组织，所以，我们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她说。丹麦是北欧一波罗的海选区（包括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成员国之一，并且只有3.52%的合计投票权。

幸运的是，IMF决定的形成机制很特别，是通过执行董事会的辩论和非正式地寻求成员国之间的一致意见，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投票，而且北欧国家也确实拥有某种道义上的权威。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6个经济体中有4个不仅位于斯堪的纳维亚，而且北欧国家还是世界上以相关条款进行海外发展援助的最慷慨的实践者。该选票区内的讨论自由地（有时也是热烈地）进行着，Andersen说，执行董事所持的态度，是由各国资本共同决定的。“这和那种只以一个国家为主导的选票区是不一样的。”

默默地取得成功

Andersen总是欢迎变革，而她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取得的成功，部分原因似乎就是她的适应能力。“活到老，学到老，”她说。在她今年10月准备以65岁的年龄退休时，她打算至少花一部分时间培养自己早年的一些职业兴趣（她最近刚被任命为哥本哈根大学委员会主任）。这里是她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职业生涯的起点。但最重要的是，她说，“我渴望在自己和孙子辈们身上多花一些时间。”

在Andersen做退休准备的时候，有的人则忙着挑选她的继任者。她的角色不容易做。Andersen在其任期内默默无闻地获得了成功，确保克朗在动荡的年代里保持稳定，因而使丹麦成就了1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业绩。期间财政政策与结构改革固然起了关键作用，但中央银行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通过加强钉住汇率的可信性，Andersen也牢固地确定了丹麦中央银行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系统的可信赖角色的地位，因而使其尽管处于欧元区的外围，但却能保持其相关性。当然，那些负责寻找Andersen的继任者的人们应当注意，世界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他们要找的人应当同时具备Andersen的果敢与专长相结合的品质，以便适应新的挑战。

Camilla Andersen，《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她与Bodil Nyboe Andersen没有私人关系。



发现 一种声音

在各种吉祥预兆下进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旨在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其中的小国和穷国更好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出于这一理由,该轮谈判在2001年末推出之时就被称为多哈发展议程。但在三年多的进程中,谈判只取得了微弱的进展。在2004年7月末进行的关于农业和工业产品“谈判框架”协议草案的谈判,也只是使谈判保持在进行状态中。而且,该协议草案在贸易回合的“发展维度”的确切含义上产生了严重问题。

表面上看,协议草案是符合许多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所宣称的目标。它们希望与自由化相关的义务,包括农业领域(在该领域,它们担心的是食品安全)的义务最小化,希望能够降低由于向主要富国出口产品提供优惠准入条件而带来的损失。它们还希望为追求发展的优先事项而留有“政策空间”——也就是说,希望避免执行国际规则,因为执行国际规则代价高昂,或者会限制其实施补贴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并在必要时对外国投资施加限制的能力。换句话说,它们希望拥有富国在过去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程度较低时所拥有的那种自由。

但是,这种战略是否真的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对多哈回合的许多模拟研究证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以及其中的大多数次组别从大喜过望的结果中获益颇丰。这些收益中最大的一份应该来自发展中国家本身的自由化。而履行国际义务能够保护“政策空间”免遭国内既得利益的侵蚀——如

果留有政策空间意味着会导致制定坏政策的话,留它也无用。从这个角度看,偏重于避免自由化的战略似乎会对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人认为,如果选择退出自由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侵蚀与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相似的那种新得到的谈判强势。确实存在产生

双层体系的风险,一层受制于新的规则、新的承诺,并能够得到新的利益;一层则被抛到一边。

是什么阻碍着多哈回合取得进展?

发展中小国的困顿是问题之一。过去的贸易回合谈判通过条件交换而取得了进展。而且,撇开追求最低限度的自由化不说,发展中小国一般都授予进入它们主要市场的特权,但却很少见到其贸易伙伴给予的贸易“特许权”有所提高。也许有必要确定更宽泛的发展重点来打破这种僵局。较贫穷的国家如果要克服其

恐惧心理,就需要得到支持,同时要进行调整,把握开放贸易带来的一切机遇。这反过来意味着要求富国加速金融和技术援助。而且,有些规则从发展的角度看可能不适宜,不应强加给那些实施它们可能会产生弊端的国家。

以下几篇文章考察了一些发展中小国关切的问题——这些小国第一次在全球贸易对话中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并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谈判力量。开篇的文章是世界贸易组织专家就为什么弱小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到多边贸易体系而发表的论辩。

消除发展中小国 在世界贸易 谈判中的 恐惧心理

Hans Peter Lankes

IMF 政策制定与检查部贸易处处长

为什么发展中小国应该参与

3 关于多哈回合热门话题的三个观点

在过去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弱小、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日益为更多地参与全球贸易体系而犯愁——害怕它们会因来自富国的产品而被击跨，或者会输给物美价廉的竞争对手。这种担忧是阻碍多哈全球贸易谈判取得进展的主要因素，为了透过这种担忧获得更深入的见解，本刊发表了三位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 Rubens Ricupero 强调，消除发展中国家对自由化影响的担忧需要具有可操作的倡议；世界贸易组织南非代表团团长 Faizel Ismail 指出必须特别关注最弱小的成员；柬埔寨主管商业的国务秘书 Sok Siphana 则强调，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是最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柬埔寨已经设法让 WTO 的规则如愿地发挥作用了。

1

首先要战胜恐惧心理

Rubens Ricupero

问题应重新表述为：为什么发展中小国害怕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把恐惧心理作为核心要素来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正在适应谈判的方法；相反，它仅仅是对事实真相的一种认识。恐惧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小国为何不愿加入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解释。恐惧并不总是没有理性的或者不可解释的。如果它是由实际存在的危险所导致的，设想在贸易开放会带来理论上的收益之类的学术争论影响下这种恐惧就会烟消云散，也是无济于事的。

必须认真对待恐惧心理的具体成因，并予以消除。在贸易谈判中，它们能够简要地分为三种一般的类型：

- 在危急关头担心不能理解问题的实质，或不能掌控谈判技巧和资源，以有效参与艰难的谈判角逐；
- 担心谈判会产生非常明确的负面结果：丢掉就业岗位、失去优惠的幅度、丧失食品安全、使粮食净进口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以及担心执行复杂的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之类的强制制度会带来高额成本；
- 担心在质量、价格和产品范围方面没有竞争力。

缺乏谈判技巧

第一类的多种担心只有通过参与谈判的人进行技能培训以及推动对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具体立场进行反复分析论证来加以解决。提高谈判能力远比解释贸易协议的内容和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技术咨询之类的传统技术合作概念宽泛得多。正如我们在贸发会议中设想的，当我们在 1996 年推出“贸易谈判积极议程”时，最初目标是雄心勃勃的。宗旨应该是培养各国根据其潜在竞争优势构建自己的谈判战略的能力以及供应某种产品的能力。一些机构已开展了此类工作。至少从概念性计划来看，最好的结果大多出自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技术援助的机构间一体化框架（有关详情见第 17 页的专栏）。然而，为项目实施提供资金是最大的障碍。但也可能存在这样的例子，即将以贸易为导向的技术合作作为一种对未来谈判的完整的可强制执行的承诺。

不确定的结果

当面对实在的、具体的举措时，一些国家每每会为具体的损失而担忧。诸如欢迎 IMF 对因优惠幅度被侵蚀而受严重影响的国家提供金融支持的决定就

到全球贸易体系中？

属于此。还有一些提案也与此类举措具有同样的性质，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和联合国粮农组织为处理粮食净进口国的问题而开展的联合工作等。无论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否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行政管理成本的实质性增加——犹如 WTO 知识产权保护协议那样——这种实惠的减少都必须在成本和效益的总体平衡中加以考虑。此外，实施和转型时期还必须反映被考虑国家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可获得性。

在第二类关切的问题中，对就业岗位丧失的担忧也许是最严重的，因为它对社会不稳定具有潜在的影响。鉴于许多指标表明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就业方面存在短期和中期的错位，这一问题不应低估或小觑。这些国家的贸易正在迅速自由化而没有社会保障网作补充。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从 40 多年前肯尼迪总统当政起，该国就制定了贸易调整案作为对重大贸易谈判的辅助措施。2002 年通过的该议案最新版本与贸易促进授权书一起，标志着政府将支出数百万美元用于培训、教育、医疗保险和养老金。这个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尚且将调整视为贸易自由化必不可少的工具，那么，国际社会为缺乏国内资源的国家设计一个类似的多边援助方案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相互对立的问题

最后，有的担忧是由供应方面的限制因素引起的。许多发展中小国仍旧依赖于一种、两种或三种大宗商品——例如咖啡、可可、棉花、蔗糖、棕榈油和石油的出口。很难使这些国家相信，对于它们所关心的供应过剩、价格过分波动以及给予生产商的最终价格百分比日益受到侵蚀等问题，它们只要稍微做点什么或什么也不用做就能通过谈判获得好处。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使它们的出口多样化，并通过提高投资、科技和管理技能来加强生产部门。柬埔寨、莱索托和毛里求斯就是成

功的例子。一旦国家改善了生产结构，它们在谈判中的利益就会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自发结果。

在弱小而且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中，如果重大的贸易谈判是由对类似结果的社会影响研究所支持的，那么大多数、也许是所有的担忧就统统能够解决。现今没有人会梦想承担一个未经环境影响评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为什么我们不应该采用类似的方法对贸易自由化的社会影响加以评估呢？如果用平衡的和回应性的方法来对待贸易自由化，这种新方法就能成为消除谈判恐惧心理、树立对贸易体系的信心，并提高发展中小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融合度的强有力工具。

Rubens Ricupero，巴西前财政部部长，1995 — 2004 年任联合国贸发会第五任秘书长。

2

援助也需要自由化

Faizel Ismail

自从多哈贸易谈判开始以来，WTO 的成员方一直为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如何应付过多复杂的贸易与发展问题而争论不休。这些问题因乌拉圭回合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使全球一体化格局发生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开始成功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并极大地提升了它们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较小的经济体则随着在世界市场份额的下降而日益被边缘化了。

这种变化中的全球背景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根据其发展需求给它们以特殊考虑。但迄今为止，对如何把握贸易周期中什么东西应被认为是特殊的并区别对待，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一种新方法

如果多哈谈判要在这一领域取得进展,就需要拥有一种新的理性方法。我想就此提出以下四路出击的战略。

(1) 资金援助。一些研究表明,尽管多哈贸易回合谈判的成功能使至少1.4亿人口摆脱贫穷,并使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但与贸易改革相伴随,还应在低收入国家采取辅助行动,以支持调整,加强对供给的回应。而如果发展中国家要采取这些步骤,就需要发达国家给予更多额外的资金援助。欧洲经济发展史为我们深入考察以往贸易一体化中曾做过怎样的努力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二次大战以后的马歇尔计划推出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抵消使西欧永久性地脱离多边贸易体系的力量(Foreman-Peck, 1983)。”欧洲一体化本身是由向薄弱国家和地区提供的经济援助来资助的(Tsoukalis, 2003)。

所需资金从何而来?一个来源应是来自多哈回合受益者的循环基金——研究表明这些受益者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是最大的受益者。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受益,并可由此而使许多政府的税收收入大大增加。应将这笔收益的一小部分拿出来,帮助低收入国家弥补调整的成本以及建立必要的能力。

(2) 能力建设。许多发展中国家争辩说,它们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常常受制于满足卫生和技术标准所需的高额成本。WTO也认识到有必要解决发展中国家能力受限的问题,并承诺提供加强的技术和能力建设援助,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参与各种谈判的效率,满足WTO的规则和卫生与技术标准,并使它们能够对自己的经济进行调整和实现多样化。

(3) 脆弱性。发展中国家对关税和农业补贴的多重减让寄予过高的希望,并希望从中大大获利。但随着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它们中的一些国家也会因为自己享有的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优惠条件价值降低而受到严重伤害,而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决策者还需要控制预期的财政收入流失、食品进口的高额成本以及调整和多样化的需要,但这一切应该以不会加剧现有的世界市场扭曲,不会使发达国家现有保护水平进一步长期存在的方式来做到。

(4) 政策空间。在关于市场准入的农业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还主张根据食品安全标准、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而对特殊产品增加保护,并为调整留有空间。对于工业产品,还可能会根据发展需要而出现类似情况。准予留有“政策空间”就会随之而出现发展中国家增加限制性(或固定)关税,以便从遵守基于

规则的制度中获利,而不会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情况。

许多需要更谨慎地利用某些贸易政策工具来加强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还希望WTO的规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怎样才能使WTO的灵活性受到监督?可以设立一个多重监督机制,以甄别什么情况下WTO的规章制度不适用而需使其更具弹性,以对发展的需要做出回应(见本期Bernard Hoekman的文章)。

结论

采用这种四路出击的战略来应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需要使WTO的规则与发展中小国的发展目标更加协调一致,并使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更为圆满的结果。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Faizel Ismail于1994年加入南非新的民主政府,并领导了南非与欧盟、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以及一些双边贸易伙伴和WTO的贸易谈判。他于2002年5月参加南非驻日内瓦WTO代表团。

参考文献:

Foreman-Peck, James, 1983, "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Totowa, New Jersey: Barnes & Noble).

Tsoukalis, Loukas, 2003, "What Kind of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柬埔寨没有回头路

Sok Siphana

2004年10月柬埔寨加入WTO标志着它重新回归全球贸易体系。十多年前,柬埔寨恢复了与IMF和世界银行的关系,并于1999年加入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入WTO标志着柬埔寨走完了回归主宰着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地区与国际组织的最后一步。

柬埔寨跟其贸易伙伴一样,将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视为融入全球经济,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一个手段。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柬埔寨真的从加入WTO中获益了吗?他们认为,WTO中30个最不发达的成员并不能确保得到与其发展需求相称的贸易机会。鉴于加入WTO的过程旷日持久且困难重重,他们对有如此多的经济体想成为WTO的成员感到惊奇。然而像柬埔寨这样的穷

国还是将加入 WTO 当作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用柬埔寨首席谈判官 Prasad Cham 的话来说,“当此严峻而又残酷的全球竞争时刻,我们国家的生存取决于我们在正确时刻抓住正确机会的能力。我们相信,加入 WTO 目的即在于此。”

加入 WTO 为 1200 万柬埔寨人提供了可靠、确定、无歧视地进入 147 个贸易伙伴的市场机会。加入 WTO 还使柬埔寨贸易改革的进程从增量的方法转变到制定包含十分详细的规则的贸易政策上来。该政策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构成了在柬埔寨经商的方法。

在加入 WTO 的谈判过程中,柬埔寨实现了其所有主要目标:首先最重要的是,加入 WTO 使柬埔寨得以保护其主要的出口工业——服装业免于配额限制,并使服装出口超过了 2005 年的配额。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柬埔寨的就业也得到了保护。柬埔寨还避免了履行降低适用关税的义务;它还保留了向出口商提供免税获得进口原材料和其他投入品的能力。

WTO 的成员资格还确保了柬埔寨能够无障碍地进入外国市场,从而有助于其改善投资环境。我们正在改善商务立法框架,加强商业服务基础设施。国家保留了充分的灵活性来制定适当的政策以支持农业部门,并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方面以及公共卫生保健的多哈宣言中充分获得利益。柬埔寨最近通过并颁布了一项法律,直到多哈宣言一致通过的 2016 年的最后期限之前,基本上不考虑收取药品专利费。这意味着柬埔寨政府和公众不必为药品支付较高的费用。柬埔寨因此而推进并加强其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方式,成功地把握了加入 WTO 带来的机遇。

然而,这种成就重要性的充分显现取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国加入 WTO 实际上并不保证它就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成功。它只是提供了一种供政府、私营部门和其他利害相关方利用的机会和保障。这是一种契约:履行义务并利用机会所带来的优势。如果说加入 WTO 给柬埔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的话,那么它并不保证这些可能性会自动转变为优势。为将潜在优势变为现实,在未来数月乃至数年,还有大量的艰苦工作有待我们去做。

尽管加入 WTO 将以最惠国条件给柬埔寨带来进

入成员方市场的机会,但也将使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面对外国货物和企业更激烈的竞争。因此,柬埔寨有必要通过消除各种障碍来使自己的投资环境向国际规范靠拢,因为这些障碍使柬埔寨的出口商与在同一市场上竞争的其他出口商相比处于劣势。

我们所传递出的信息很清楚:柬埔寨选择了解除保护,参与竞争。不能认为柬埔寨是“免费乘车者”(只图从加入 WTO 中获取好处而不为之做出贡献)因而在谈判中无足轻重。

由于得到了大多数豁免(分为特别对待和差别对待),并且在 WTO 主导的一体化框架下得到了慷慨的技术援助,同时由于前摄性亲一体化政策的刺



金边附近的服装厂

激作用,柬埔寨被摆在了加入 WTO 后日益严峻的一体化挑战之下。

柬埔寨经济变得越加开放、越有竞争性,进出口商、柬埔寨公民以及外国投资者就越能够从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制度的立法保障中获得好处。毕竟柬埔寨尝过 20 年经济封锁和与世隔绝的滋味,也有过 10 年一体化与繁荣的经历。

任何人如果对开放还心存疑虑,那就试试闭关锁国的滋味吧。柬埔寨已经不会,而且也不想再走回头路。随着加入 WTO,我们已经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现在是打开新的一页,展望我们美好未来的时候了。

Sok Siphana, 柬埔寨主管商业的国务秘书,他领导了柬埔寨加入 WTO 的谈判。



巴西运送轿车的卡车

让 WTO 更 有助于发展

Bernard Hoekman

如何帮助 发展中国家 融入到全球 贸易体系

在世界贸易谈判中，试图建立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和允许某些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选择退出或例外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局面。世界贸易组织（WTO）期望通过众所周知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来妥善处理这种局面。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包括高收入国家承诺提供其市场的优先准入，有权限定贸易谈判回合中的互惠，以达到“与其发展需要相一致”的水平，

以及使用其他受限制的贸易政策更大的自由度。其潜在前提则是，在一段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需要得到援助，包括其国内市场（保护）和出口市场（优惠）。

但是对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是有争议的。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现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并非十分有益：一直以来，优惠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价值有限，这是由于受例外条



款、非贸易限制和供应能力有限的制约。与此同时，非互惠和对贸易壁垒的约束力较弱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更为迅速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例如一直存在的保护倾向阻碍了出口和生产率的改善）。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优惠是必要的，因为工业化国家一贯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从而阻碍了贸易体系的发展潜力。而且，历史上富裕国家以多种方式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这种情况正是现在WTO所要约束的。因此，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是必须的，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同等的机会。

限制性的贸易政策或许有助于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尽管如此，为使这些产业变得更有效率，它们需要寻求引进最具竞争力的供应商，并且把其产品推向市场竞争。至于贸易政策对国内产业的支持如何有效，无论人们的观点如何，理论和实践均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降低贸易壁垒以确保贸易政策对国内产业的有效支持。作为各国之间为减少贸易壁垒进行谈判而建立的一套机制，WTO可被视为有助于发展的。

从发展前景来看，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WTO是受商业利益驱使的：各成员都希望通过享有对其他成员更多的市场准入来改善其贸易条件。关注的焦点并非各成员的社会福利或经济增长前景或者识别政策是否“良好”，而是国内政策以何种方式给其他成员施加成本。现实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补贴（用以弥补市场失灵）对一个成员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即使这样做会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

其次，WTO所涉及的范围日益扩展，超出了贸易政策的界限。国内管制政策的存在与否，可能会产生强大的经济效益，即使这种情况会给其他成员带来一些负面的溢出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即是一个例证——对于贫困国家来讲，有限地实施可能是最好的选择（见专栏1）。政策的调整或将导致较贫穷国家执行成本增高而且不均衡，与其所减轻的负担不成比例。采用更长的过渡期——乌拉圭回合采用的基本工具——就是一个不适宜的对策。

第三，没有采取措施来确定从特定WTO协定中受益的前提条件，以及此协定是否令人满意。也没有一个机制去监督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下的政策效力，或者证明其他可选择性政策（包括发展援助）可以令贫困国家更有效的达到目标。回到有关补贴的例子，假定发生了干预情况，在应对市场失灵时，补贴或税收通常比贸易壁垒更加有效，但政府可能没有能力去使用它们，因此会采用更加扭曲（成本更高）的贸易政策。

最后，传统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造成发展中国家之存在明显的歧视，愿意享受特惠待遇而反对贸易自由化，以及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

目前WTO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方法主要集中于对特定协定中选择退出、规则和免除情况的详细谈判。例如，多哈回合提议允许发展中国家指定特定产品，并对其农业产品使用特殊安全保护措施。这需要贫穷国家在个别议题的基础上确定可以受益的特定条款。这些内容是什么可能不会很明确，受商业利益的驱使，发达国家同意接受上述提议是很勉强的：他们对于一项提议的预期成本，并非是该提议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否有意义。本文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转变。这种方法将使WTO更加支持发展，并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中，即所有WTO成员接受一套核心承诺并允许在其他领域应用。

有助于发展的WTO

如何使WTO贸易协定更加支持发展？可以证明的是这些协定应当：

专栏1

柬埔寨：受制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近期的案例研究表明，加大WTO强制执行政策的灵活性需要巨大付出。例如，柬埔寨通过立法巩固知识产权协定取得显著成效，强制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执行该协定。政府起草了商标、专利、版权、商业秘密保护、不公平竞争以及植物品种保护等法律。为律师、法官、执法部门和海关官员设立了培训课程。并加快起草法律和规定的速度，出版此类主题的高棉语书籍。

虽然其多数费用由捐赠者支付，但是值得怀疑的是，其收益是否可以弥补这些支出，而且在该协定的制约下，柬埔寨在未来的数年不太可能成为高科技产品或药品的生产国。事实上，强制执行知识产权的经济成本可能会数倍于直接行政管理的成本，而且该地区投入于人力资源的机会成本非常令人瞩目。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先前制定的法律是否考虑到了发展前景，以及上述成本是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不过，这个问题不需着手解决，因为加入WTO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完全采纳《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清除外国对贫穷国家生产的产品的贸易壁垒。
- 降低国内壁垒，国内壁垒提高了价格，减少了企业与居民消费的产品与服务的多样性。
- 支持采用增强发展的补充规则和制度。

政治经济的力量限制了第一个目标的实现。在以商业为目的的WTO中，小而贫困的国家无力令大国改变对其造成伤害的政策。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优先准入的范围部分依据观察资料给出。很多最贫困的国家迄今为止尚未能使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以增加其出口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此外，在WTO的相关政策中，优惠权并非强制性承诺，而是“尽最大努力”的承诺，实践中还要受制于许多限制和条件。第二个目标需要进行国内改革，此处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政治支持推动改革，给定的财政约束，产业政策目标，而事实上非互惠的优惠权计划可能意味着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已经实现自由准入。第三个目标的实现可能会面临实际情况的阻碍，已采用的规则经常是高收入国家制定的。WTO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必要时，挑战就会引入灵活性，而且与此同时将巩固贸易体系。该体系的重要任务应该是采用良好政策——逐步增加透明度，并且减少经营者所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贸易体系的这项功能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新方法的提出

使WTO更加有助于发展应包括以下3个基本点：

- 第一，发展中国家无条件地接受关于市场准入的一套基本规则——包括最惠国原则、约束关税以及承诺在未来减少关税——也就是原则上接受全部的WTO规则。
- 第二，允许各国基于发展不执行“非核心”的WTO规则，与贸易与发展团体的代表（捐赠者，金融机构）在多边框架下就相关的政策的效力和影响进行商榷。评估这些政策时应当考虑到其负面溢出效应，而且应当在相关国家公布，以增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 第三，作为一种“贸易援助”形式的差别贸易优先权发生了转移，加上在最贫穷国家巩固占主导地位地位的赠款融资目标，以改善贸易供应能力及其增强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并通过贸易自由化再分配部分利润。

目的并非使WTO成为一个发展机构。即使切实

可行，这样做也是有悖初衷的。相反其目标是创造一种可行的机制，以使发展中国家更进一步地融入到WTO中。

WTO协定是具有约束力的协定：强制执行承诺。这可体现WTO的价值——贸易商具有了政策上的确定性，政府认识到当做出承诺时，他们购买的什么。

“发展中国家接受核心规则需要权衡的是，较高收入国家增加发展援助，并以增加的发展援助逐渐取代优惠。”

允许留有“政策空间”——或给成员方推行的政策留有余地，否则这些政策将受制于多边规则——将会增加不确定性，减少主要贸易方首先做出承诺的积极性。就WTO一系列核心规则给所有成员方施加了约束性义务达成一致将有助于缓解这一顾虑。因此，如违背核心规则将通过现有的争端解决机构去强制执行。

协定必须界定核心规则所包含的内容。显而易见它将包括透明度、最惠国待遇、非使用配额，约束关税以及自愿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贸易回合中降低上述关税。为什么是这些呢？因为贸易体系是基于这些基本原则建成的，而且对所有国家都有利，无论其发展水平如何。如果此项被认可，将意味着核心地区的多边承诺将比现存的更加有力。特别将意味着发达国家非互惠贸易优惠的结束。这符合系统的（最惠国原则）和发展的原理。这些迹象表明，那些能够从贸易优惠中受益的国家已经这样做了，尽管没有面临阻碍其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的国内约束。最主要的需求是应对约束，并且清除那些有悖于非歧视原则进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扭曲贸易政策。因此，发展中国家接受核心规则需要权衡的是，较高收入国家增加发展援助，并以增加的发展援助逐渐取代优惠以推动其贸易能力。另一个需要权衡的是在政策的灵活机制下，非核心规则趋于合理。

如何利用政策的灵活性？

在WTO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在发展中国家



应用的差别成为一个敏感话题。许多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反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仅限于那些较贫困和较落后的国家的提议。作为一个可行的机制,发展框架的主要优势就是能够避免谁是合格者的假定。一种方式是允许所有的(自定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采用这一程序,但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对“溢出效应测试”的明确考虑——其范围包括特殊政策对其他国家产生的负面效应。这可能与实际原则产生差异,下面将会进一步讨论。

鉴定非核心政策 谈判将评估非一致性政策(非核心)的影响和效力。这首先要要求鉴定这些政策。传统方式是通过争端解决来处理,而对于小而贫穷的国家来讲,则不大可能采用争端解决程序(事实上,经济贫困的现状导致贫穷国家的请求被忽视)。目前,WTO只有两个机制来鉴定较小国家的非一致性政策: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和特殊协定应用监督委员会。可以论证的是,前者虽然建立了一套颇具价值且透明的评判方法,但并未得到充分使用,因为不允许WTO秘书处对遵守相关WTO政策的一致性进行判定,而且对内部和周边国家的影响没有被考虑在内。这种方法并不常用(每6年或以上)。WTO特殊协定委员会主要(变化)关注实施立法及其应用——而非政策的经济学原理及其政策效力,此外较大市场的中心优势也得到关注。

新的发展框架与扩展的贸易政策评审机构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可能提供有关发展中国家政策效果的更多信息。考虑到适当的顺序以及互补的改革和投资的需要,内在识别这些工具是否达到了发展的目的以及是否减少了贸易扭曲的评估将需要判断。这些必须由经验丰富的来自其他成员方的政府和来自发展及金融机构的组织来完成,许多原因可以说明后者被包括在内是必要的。首先,他们得到任命,具有经验,具有地方性,具有为政策提供建议的能力。其次,这些机构通常率先在发展中国家创建项目和方案,并为其融资,WTO不会介入上述方案的设计和资金的融通。

上述机制的主要优势可以用于改善“发展与贸易团体”之间的沟通——确定哪里需要发展组织的帮助以及WTO条款在哪些国家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发展组织在任何此类进程中都拥有一席之地。1996年,WTO在新加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一体化框架(IF)发布了对最不发达国家与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的初稿,表明贸易部长们提供的与发展机构不一致的计划注定要失败,而发展则被要求提供援助,而且能够为最不发达国家所使用。

这就是说,如果监督机制的成员资格涵盖了WTO全部的签订者以及相关的国际发展组织,将很有可能失去效力。一种选择是寄希望于修改一体化框架,该框架于2000年经过重大反思与修正(专栏2),现已成为贸易领域国际合作的唯一样本。如果此框架能够突破最不发达国家的界限,由于存在一系列希望参与与贸易相关政策对话的群体,进使IF组织和捐赠者所覆盖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重叠。

承认溢出效应 在谈判过程中,某项政策是否强加给其他国家较高的负面财政支出将成为磋商过程的一部分,并以此鉴定存在较少贸易扭曲的可行性政策。例如前面所提及的,基本的经济学证明在应对市场失灵时,补贴比贸易政策更加有效。如果在发展中国家因预算的制约而放弃使用(暂时的)补贴,那么如果存在协定并且该协定有助于解决市场失灵,那么发展援助就可以克服以上问题。引进援助也有助于建立一套可信的退出机制,这是预防争夺和抑制寻租的关键条件。

解决争端 特殊政策与WTO非核心规则存在不一致性,虽然决定特殊政策的影响和效力的程序会增加一国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但是这些政策可能会对其他WTO成员方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它们也是发展中国家,政策空间将意味着“剜肉补疮”。这就再次表明,鉴定为达到政府的目标而制定的较少贸易扭曲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倘若这些方法不存

专栏 2

一体化框架作为一种模式

一体化框架是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与贸易相关的技术援助的,虽然未必会成为未来合作的一种指定模式,但其可以作为发展贸易政策对话的有力依据。它将主要的多边机构与捐赠方、接受方组织在一起共同解决贸易发展问题。该计划为40多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援助。

其根本目的是将贸易议程融入国家的全面发展策略,并确保与贸易相关的调整和能力建设符合一国关注的贸易政策目标,并根据其他发展援助的需要进行排序。虽然一体化框架增加了对最不发达国家内部贸易问题的了解,但许多国家仍需要更多的资源以实施其贸易一体化战略的建议。

一体化框架设有筹划指导委员会,并由轮值成员组成——包括6个多边机构,有贡献的捐赠方和资金接受方,同时也是一个处理相关对话及后续问题的跨机构工作组。

在或没有被采用，这些国家最终会求助于标准的WTO补救措施：争端解决。

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可能强加给其贸易伙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大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前面提及的溢出评估——根据各国为达到发展的目标所能够运用的“政策空间”的范围——或将成为有效的区别方式。根据定义，虽然小国家强加于WTO大成员国的溢出效应可能很小，但对其他小国家或许相对较大。因此，发展机制应当协助解决争端，而非替代它。实际，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豁免权，只要其政策不产生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并且在对较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上存在一个较高的起点。

建设能力 上述机制也可以通过突破其鉴定范围

“关于贸易协定的发展尺度存在基本的选择。这种选择超出了WTO的范围，而且扩展至整个南—北区域贸易协定。”

来帮助贫穷国家应对供应能力的约束，包括为该目的地增加援助资金。尤其考虑通过多边贸易改革（多哈回合）使较为富裕的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共享资源的约束承诺。依据自由化承诺制订的范围，上述收益潜在巨大。例如，多哈谈判达成协定，逐步取消由

于自由化而拖延的货物关税及农业补贴预算，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能力。特别是已经获得了主要市场相对自由的准入的小的低收入国家，通过援助来应对降低其竞争能力的一些制约，进而获得了很高的回报。这就是说，世界银行在这些地区（以及其他更多地区）实施方案和计划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为确保避免限制贸易扩张政策的具体实施及可持续性，最高水平的国家自主权和领导权是关键因素。正如以上所表明的，上述机制有助于鼓励实施全面减贫战略的承诺。

值得尝试

在特定国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全部复杂因素在内的拥有更大灵活性的机制值得吗？很显然，这与上面所描述的方法存在潜在的进步。小的发展中国家因其规模而很少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诉讼主体。这就意味着政策弹性机制并非确实需要，这种事实本身说明了变革的需求：对贫穷国家贸易政策给予更多的保证才是有益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接受核心规则，包括最惠国原则，从而（逐步的）赋予其贸易优惠，高收入国家明确同意通过扩展的一体化框架形式的机制认真对待供应能力的议程，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目标给予更多的关注，这将成为另一个重大转变。

WTO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是一个处理单一问题的组织：始终以贸易为中心。其他国际组织并非如此。为对抗敌对势力，创建具有建设性的焦点议题，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将更有助于增加贸易议程中的国内情况。也将增加关于现行政策手段效果的信息——这是采用更好政策的必要条件——并确保决策者已经考虑到与贸易相关的政策行动和投资。在一体化框架所采取相关的行动和处理问题时，将有大量的必要工作要进行，因此会花费更大的人力资源成本。

简而言之，关于贸易协定的发展尺度存在基本的选择。这种选择超出了WTO的范围，扩展至整个南—北区域贸易协定。同样紧张局面出现了，权力和规模的不对称程度通常比WTO还要大。在相关地区的贸易协定中，前面所提到的机制形式也应予以考虑，例如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合作协定。

Bernard Hoekman，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资深顾问，巴黎政治学院世界经济课题组客座教授

Finance & Development

Get it earlier online

www.imf.org/fandd



The complete text of *F&D* is available on the IMF website, often before the printed version comes out. *F&D* publishes online versions in pdf format in English, French, Spanish and Russian.



贸易谈判的前景为何不明朗

Aaditya Mattoo 和 Arvind Subramanian

尽管最近出现一些新的推动力量，但多哈回合一直因令人沮丧的“若即若离”的特征而踌躇不前。只要能够得出结论，尤其如果人们对来自多哈回合可能提供的贸易自由化的收益的估计——多达5000亿美元——深信不疑的话，世界境况可能会大大好转。但要使多哈回合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并非易事。如今能从贸易自由化获得的利益已大不如从前了，工业国的防卫手段也大大提高了。

无论对于工业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讲，自由化的巨大机遇无疑是存在的。而且，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和相关的贸易谈判回合为使这些机会变得可行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该框架有赖于相互间市场的开放：进口自由化带来的国内政治之痛已为利益的输出提供更大的市场机会而获得的国内政治收益所抵消。但正是现在，该框架陷入了困境。

工业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开放市场问题上的讨价还价日益难以达成协议。首先，由于把多边贸易体系作为实现进入期望市场的一种方式，工业国的出口利益已经急剧减少。其次，工业国发现它们很难通过克服国内的利益保护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准入机会。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工业国的这种隐退与（至少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认真的谈判做出的明显努力是同时发生的。

私营部门不感兴趣

从历史来看，多边贸易自由化是由公司利益驱动的，尤其美国和欧洲那些寻求进入外国市场机会的公司。在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进行的前几回合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就是由美国私营部门

推动的，当时它们的利益受到了欧洲10国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以及后来的扩大所带来的贸易转移后果的威胁。在20世纪80年代寄希望于扩大销售增加利润率的经济困难时期，美国和服务行业——尤其掌有知识产权利益的服务业——为乌拉圭回合的谈判（1986—1994年）提供了大多数见解。

WTO可能被看作工业国私营部门谋取当前利益的最好载体，这些私营部门正在为他们的制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壁垒仍较高的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寻求开放的市场。但在2001年发起的旨在解决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系的不满的多哈回合，总是由于私营部门利益旁落而受到打扰。使多哈回合成为“发展”回合的尝试掩盖了谈判中工业国的公司部门相对缺位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种缺位是由于贸易自由化单方面的成功以及多个层次的保护的有趣结

合导致的。

许多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在世界银行和IMF的敦促下采取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单方面削减了贸易壁垒。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它们免除了数量限制，关税也大大降低。由于这种情况是在WTO框架之外发生的，工业国没有必要在WTO内部来谈判确保进入新市场的机会，而这些市场是它们不花任何成本就得到的。WTO的进程因此而成为世界银行和IMF成功的“牺牲品”。

正如各国继续单方面地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一样，在地区贸易协定方面，它们也越来越多地采取这种策略。但由于WTO法律约束力弱，区域一体化可能为追求在多层面上讨价还价释放出了空间——而

“工业国发现它们很难通过克服国内的利益保护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准入机会。”

且私营部门对此也感兴趣。地区协定对多边谈判产生的系统性影响，事实上可能是有悖常理的——一个地区协定中的各个国家，事实上可能只希望 WTO 中少一些广义的自由化。因为太多的自由化可能会使它们优惠进入其他国家主要市场的权利受到侵蚀。例如最近的一些模拟研究显示，多哈回合的成功会使墨西哥受损。

服务业是这样一个领域，在这里，增进国家和全球福利的机会才刚刚开始显现出来。尽管存在显著的单边自由化，但大多数国家迄今一直急于参与多边对话。一个原因是，在国际贸易谈判场合下，很难深入变革开放服务市场所需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国不太愿意考虑扩大开放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尤其通过人员流动提供劳务方面，因此服务业部门内互惠的范围已经急剧缩小。

管理服务贸易的规则一般较软弱以及规章框架尚未制定完成，加上各国只承诺实行最低程度的自由化，使得实施结果总体上较差。现行规章机制的现实和与之相符的承诺水平之间的差距往往依旧很大。其结果使得私营部门得出这样的结论：多边体制在世界范围内提供真正开放的服务市场方面是无效率的——而且决策迟钝。

这种感觉因生产周期加速和谈判周期延长之间愈演愈烈的脱节而加强了：企业面对全球市场时必须使生产周期加速；谈判又是政府必须在其中据理力争的，因而久拖不决。异常迅速的技术进步对于诸如电讯、交通运输和金融这样的行业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如果多边反映依然缓慢而迟钝，私营部门的热忱就会进一步衰减。采用非政府行为方式来保证市场准入和制定标准——通过地区政府间奔走呼号，更有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甚至在知识产权领域，北方国家的公司也不对多哈回合感兴趣。其大多数目标已经在乌拉圭回合实现了。它们还在追求它们仍然感兴趣的事——通过地区渠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这种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在美国与约旦、墨西哥和越南谈判达成的地区协定下，这些国家为药品和测试数据（用于使药品通过管制规则的批准）提供的保护，远远超过 WTO 以及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所规定的标准。总之，专利持有者的垄断权利增加了，与之竞争的普通生产者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北方国家日益增加的防卫手段

自从乌拉圭回合以来，在多边场合进行任何讨价还价都会要求满足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即北方

国家开放市场，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清楚了。由于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全球贸易者的紧迫性，WTO 系统必须使其市场准入优先事项更加适应要求。这些优先事项是什么？北方国家会提供吗？

从南方国家的比较优势来看，它们会在四个领域寻求市场准入：农业、纺织品、劳动力流动以及劳务的跨境供应。与这些领域开放有关的政治问题各方之间各不相同。在农业和纺织品这两个最受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保护的传统部门，政治上的困难众所周知。法国农业利益集团以及美国制衣业在过去几年中坚持实行自由化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效。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它们也正在或即将面临着令人痛苦的争端。

欧盟吸纳东欧及其以外的新国家来扩大疆域——以及由此造成的预算压力——使其有必要减少补贴。美国目前根据乌拉圭回合解除服装配额的举措正在使国内企业暴露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之下。这两方面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预先决定的。欧盟可能希望将削减补贴作为一种隐含的让步手段来采用，并希望其贸易伙伴也以让步相回报。然而，在如今这个预算困难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参与贸易谈判的各方已不在天真幼稚的世界上，只有在欧盟的改革步伐超越其应承担的改革义务的情况下，它的“付出”才会得到实际回报。在这个多变的时代，欧盟在农业方面、美国在纺织品方面不可能进一步自由化，发展中国家不能对此抱有更大的期望。工业国在多哈回合会做出多大的承诺呢？

在服务业谈判中，劳动力的流动始终是一个困难问题，而现在甚至在服务业跨境贸易的开放方面也出现了不确定性。确保熟练专业人才的流动对于埃及、印度、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具有深切的利害关系，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确保非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方面有着利害关系。尽管使劳动力能够更自由地流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互惠互利，但迄今为止，在移民政策的作用下只是勉强地发放移民许可。传统政治上的困难加上对恐怖主义的新担忧，使得实现更大的开放度看起来一言难尽。

工业国在所有跨境的服务贸易中占了 3/4 以上。而巴西、哥斯达黎加、印度、和以色列则在过去 10 年中商业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超过 15% 的 20 个发展中国家之列。这种增长以及服务业就业岗位外流引起了许多工业国深刻的担忧——削弱了它们所拥有的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所让出的利益的更充分估算可能要待将来才能进行，这可能会导致更有启迪性的战略的制定。但目前，在工业国不可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情况下，看来它们会勉强保持现有

的跨境贸易开放度。

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了参与的新意愿。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看来对在 WTO 背景下，对迄今受到保护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子部门考虑实行认真的自由化表示出日益强烈的意愿，前提条件是其工业国伙伴愿意进行条件互换。例如，拉丁美洲国家愿意进一步开放金融和电信部门，以换取美国和欧盟在农业方面的有意义的让步。同样，如果劳动力的流动对于议程来说是严重的问题，印度和菲律宾愿意在削减贸易壁垒方面加大开放度。

对此问题我们是否一直糊里糊涂？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是多边体系中声名狼藉的拖延者。这些国家可能还会发现它们难于默许服务业的多边自由化，因为这会给它们带来后续的改变规章制度和其他国内改革等问题。但今天面临的困难是，要使这些国家相信它们所进行的改革是必要的，还要使它们认识到如果它们能在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市场，从政治上看，国内的改革就更易于进行——这使我们对前景更感乐观。这些发展中国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仅对其农业和以劳动力为基础的服务业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感兴趣，而且更关键的是，它们还可以将此作为深化国内改革的手段。

冒险做个预言

如果我们这里所做的分析是正确的，多哈回合是否富有意义，前景就可能不太明朗。我们担心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即一些有限的让步会获得同意，这种让步主要是根据在欧盟削减对农业的补贴方面以及发展中国家锁定（固定下来）它们已经采取的服务业改革方面已经做到了什么而做出的——而这种一揽子让步会被宣告为多哈回合的成就。

我们是否会因此而过度愤世嫉俗？十年前“成功”的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得出了全球会获得较大福利收益的估计。但是，根据各种模型做出的自由化假设与乌拉圭回合实际达到的效果相比大打折扣。这些模型假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农业和制造业实行了实质性的自由化。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把“自由化”归咎于乌拉圭回合是凭空想象的事，甚至是不实际的。自由化只是稍稍有所增加：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发展中国家同意将关税固定在一定水平上，它往往高于通行的水平。

对于工业国来讲，富有意义的自由化采取的是取消配额的形式，但只有非常少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一目标。在农业领域，各国设定了非常高的关税水平以抵消配额的取消（即所谓“关税化的污点”）。关税的降

低由于选择基期年份的神秘程序而变得不切实际，而这个基期年份往往大大早于进行单方面削减的年份。而且，模型的估计数还容易造成对知识产权协定影响的忽略，该协定的实行可能会减少福利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

我们并不是说 20 世纪 90 年代就没有自由化。我们也并不认为没有价值去继续实施已经进行的改革。我们所要说的是，贸易回合谈判的收益被夸大了，而其成本则被贬低了。乌拉圭回合所有削减壁垒的伎俩中，无非是工业国通过解除服装配额来换取发展中国家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他做法确实不是很多。尽管服务业的框架协议和农业的关税化设定了未来自由化的步骤，但各方都出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更多主张。昨日之未来皆已成为过去，我们将会看到，以实际价值来衡量，这些框架协议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自由化。

“会有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它会再次造成在某个子虚乌有的发展方面谈判获得了成功的假象。”

我们强调这些关切是为了告诫人们，会有一种难以承受的压力，它会再次造成在某个子虚乌有的发展方面谈判获得了成功的假象。一个富有意义的发展回合正面临受阻的挑战。在工业国，这种挑战包括当工业国就取消配额达成协议的时候，削减纺织品关税；当农民为是否接受减少对产品的补贴而斗争的时候，削减农业关税；当恐怖主义的阴影笼罩着移民政策的时候，确保劳动力更加自由地流动，以及当服务外包的繁荣造成对就业保障更深的忧虑的时候，追求更开放的服务业跨境贸易。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挑战就是利用 WTO，以这些国家从未尝试过的方式，对商品和服务实施富有意义的自由化。

聚集政治意愿来应对这些挑战现在正当其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让我们在多哈回合尘埃落定之时用事实说话吧。那时，我们将用一个明确的基准来评价这一回合，这个基准能表明该回合带来了多少额外的自由化。

Aaditya Mattoo,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组的首席经济学家。Arvind Subramanian, IMF 研究部部长。



多哈回合谈判能 取得的成就 将远超过怀疑者的预期

William R. Cline

如果所有的全球贸易壁垒都被废除，那么在15年内大约将有5亿人口脱离贫困。发展中国家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亿美元，其中，至少一半以上的收入是由于发达国家废除了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贸易保护所带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召开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为国际社会取得这些成就提供了最好的而且是惟一的机会。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道路上，我们期望多哈谈判走多远才是合理的？如果美国、欧盟（EU）以及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

导人为实现以上目的而努力施加压力的话，我相信它能走相当长的一段路。

要产生怀疑是很容易的。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对某些领域——农业、纺织品与服装——的高度保护被广泛认为是此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政治方面最难以处理的事情。有些人指出，过去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自由化经常是单方面的，这减少了发达国家制造商在自由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的剩余利益。同样，也有人指出，在之前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与知

照片显示了一群工人正在巴西的一条生产线上装配汽车。

知识产权利益团体所寻求的许多目标都已达到,因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他们不再热心于施加压力。然而,没有了来自出口利益集团的压力,那些参与进口竞争的利益集团则倾向于采取保护政策。此外,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其谈判结构而复杂,因为他们希望在“单一承诺”方面达成一致。这可能存在一些风险,譬如,最不发达的国家由于害怕破坏现有的特惠待遇,而阻碍自由化扩大。

然而,多哈回合谈判实际上取得的成就可能远远超过怀疑者的预期。首先,该谈判召开于一个历史性时刻,此时的环境已不再是“例行公事”了。纽约、华盛顿、马德里以及其他地区的恐怖袭击使人们更加明白,在减少全球贫困方面的进展,无论对于消除那些滋生疏远情绪的环境,还是对于移除任何具有合法性的这类行为都是非常关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哈回合谈判亦被官方指定为“发展回合谈判”。此时,恰好新的主要国际援助方面也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成功的多边谈判需要来自于高层的强大政治压力。七国集团的首脑非常清楚,承诺一个发展回合谈判具有很大风险。同时,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贸易开放是将利益传送到地球上那些贫困人口的一种有效方式,而且它也同样给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带来了利益,而不是给他们强加财政负担。

其次,许多贸易保护还需要通过按照传统的互利互惠原则进行谈判来解除。尽管大家对于贸易开放的优点有了新的认识,但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方面仍然保持着较高等度的贸易保护——虽然已经比20世纪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高峰时期要低很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所实行的制造业关税税率平均约为15% (按照贸易量与GDP进行加权平均),“约束”税率(达到此界限时,保护可以合法地恢复)甚至更高。而在发达国家,纺织品与服装之外的制造业关税平均仅为3% (纺织品与服装关税平均为12%)。因此,发达国家的制造者强烈希望,在进一步减少全球贸易保护的问题上能够谈判成功。为了将这类互惠的、减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度(包括农业)的压力调动起来,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准备就其约束税率的削减进行谈判,从而使约束税率能远远低于当前实行的税率。如果仅仅只是通过降低约束税率,仍然让约束税率高于所实行的关税水平,寻求削减“关税里的水分”——给国内产品提供过度保护的过高的关税税率——将不能带来重大突破。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强烈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减少对于农业以及部分工业中高关税(包括纺织品与服装)的保护。据我的估计,如果同时将关税以及跟关税相当的国内补贴考虑在内,美国的农业保护大约

为20%,加拿大与欧盟为50%,日本为80%。一个互惠方案的其他方面还包括进一步开放一系列的服务,可能还包括在临时劳动市场准入方面的一些进展。

第三,美国与欧洲在预算上的压力使得做出有意义的承诺的时机已经成熟,即承诺降低对农业产出扭曲的补贴。美元的下跌将推动世界农产品的美元价格上涨,从而倾向于减少补贴基础的规模。此时,削减美国财政赤字的巨大挑战,将给有限范围的自由支出(其中包括农业补贴)带来持久的压力。如果最近WTO有关美国棉花保护的规则如预期中一样的话,也将促使美国对农业补贴进行改革。在欧盟,新成员国的加入意味着将补贴与产量联系起来的费用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进一步将补贴与产量分离开来。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发展中国家坚持发达国家应该实行农业自由化,这一要求是正确的。2004年7月,发达国家已经在日内瓦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他们承诺将废除出口补贴,并在该回合结束后的第一年将其他农业补贴减少20%以上。在此之后的目标应该是更多的削减,并将补贴与生产激励严格区分开来。在提供整体互惠的协议上,这些削减应该是有范围的。

第四,令人鼓舞的是,有迹象显示主要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方面正发挥出重要的领导作用。由2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团体在坎昆会议上坚持了一个较好的方案。巴西和印度连同美国、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组成了一个名为“五国利益联盟”的团体,设计出了2004年《日内瓦框架协议》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多哈方案的一部分,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特例提供他们自己市场对来自最不发达的国家进口产品的特惠准入。这将给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提供一个新的市场机会,从而能帮助抵消一些向发达国家出口的,由于偏好错误所造成的潜在损失。毕竟,发达国家最惠国税率的削减将优势提供给了免税的供应商。最重要的是,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其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巴西、中国以及印度,能从更为自由的世界贸易中获益甚多,并能通过就他们自己的贸易保护进行谈判来充当多哈回合互惠原则的先锋部队。

在与美国官方谈判结束之前,多哈回合谈判还有两年的路要走,仍然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脑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多哈回合谈判一定能切实地推动世界向全球化自由贸易发展。

William R. Cline,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及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

成功需要 “宏伟构想”

Patrick A. Messerlin

南非金矿工人

许多贸易政策专家都对多哈回合心灰意冷，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中占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强烈支持贸易进一步的自由化。皮尤研究中心2003年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2004年的民意测验表明，80%以上的受调查者认为，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他们对前者持积极态度，而对后者有时心存顾虑。在媒体大肆报道的反全球化运动已持续10年之后，这样的调查结果令人惊异，尤其考虑到无论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还是以其保护主义言论而著称的国家，情况都是如此。

为何贸易专家如此灰心丧气，跟公众完全不合拍？毫无疑问，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疲惫。贸易专家们深切认识到，仅仅取得一点显见的进步就需要花多长时间。鉴于目前的贸易政策成本高昂，他们也对实际的作为与应该表现出的作为之间的差距深感失望。但是，说到底，心灰意冷是既得的保护主义利益最好的盟友。

基本，但是经常被遗忘

心灰意冷表现为以下五种经常听到的言论。第一，贸易政策无足轻重，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不相当或者约束太多——真正重要的是国内政策。但是，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与财政和管制问题有关，这就使人们产生了对贸易与国内政策之间是否有明晰界限的怀疑。至于WTO，其作用之一——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相辅相成的国内改革。多边贸易体制能够打破国内既得利益的现状，因此无疑是国内政策

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第二，WTO是已经落伍的老古董。然而，其他机构有几个像它一样迅速地为适应全新的世界做出了调整？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仅仅20年前——认真追求贸易自由化的不过是几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少数亚洲和拉美新兴经济体，推动关贸总协定（GATT）谈判的是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参与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的新增了10至15个新兴国家，主导谈判的是“四方集团”（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而现在，至少有20多个发展中国家成为积极的参与者，以贸易促进发展真正成为WTO关心的事务，五方集团（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也成为多哈回合顺理成章的领军人物。

第三，贸易回合拖得太长，而且似乎得了“狂躁性抑郁症”一般，起伏极大。然而，尽管多哈回合预计要到2007年结束，但它历经的8年时间仍将远远少于乌拉圭回合的12年（最初尝试启动这一回合是在1982年，结果彻底失败了）。当然，从西雅图到多哈、坎昆再到日内瓦的跌宕起伏令人想起乌拉圭回合。但是，漫长崎岖的贸易谈判回合难道是可以避免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严肃看待WTO成员方的主权原则的话。贸易谈判就好比打牌时的虚张声势。玩家共148名（尽管其中大约只有50位实际参与者），他们不很清楚搭档的牌，而且往往连自己的牌都不太清楚，这样的扑克牌游戏只能像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如果指望一个干净利落的回合，那就应该想想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中“显而易见”的改革通常要花多长时间？往往要比一个贸易回合更长。只需看看欧洲就知道了。

第四，商业界的支持不够。但是，商业界对贸易谈判的支持总是非对称的，这应该是预料之中的事：在WTO处在“一切正常”模式时给予时断时续的支持，而在形势非常糟糕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当商人每日忙于在已经开放的市场上谋生时，他们不可能将很多时间投入到支持新的市场准入之上——这是政治家的工作。但是，如果由于贸易谈判出现重大失败而导致现有的开放度面临危机，那就可以合情合理地预计，商界人士会积极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及其市场。事实上，日益直言不讳的欧洲实业家和服务商便是这种非对称性的一个大好例证。他们认为欧洲在农业方面的不作为可能危及自己进入迅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机会，于是便日益明确地表示他们不愿“受制于”欧洲农场主。

第五，双边贸易协议正在削弱多边主义。这种风险被夸大了。某些双边贸易协议已显示出向签字方中强大的一方倾斜的可怕能力——与双边协议中的某些知识产权条款相比，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看起来相当不错。许多双边协议完全缺乏实质内容，根本不可能威胁WTO贸易体制。而且，所有双边协议都会激起企业更大的反对，因为它们感觉自己虽然得到了某些协议的保护，却被其他许多协议排除在外。这使它们最终更偏爱多边谈判的方式。

多哈回合切实的成果

我们对多哈回合能有哪些切合实际的期望？这个回合不会达成一笔“大交易”。以前的回合从没做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约占其GDP的25%—35%）自由化用去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八轮回合，50年的时间。不过，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还是大有可为。富国及新兴经济体应该让农业及余下的几个为数不多但对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的受保护产业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则应致力于降低和限制其关税，尤其制造业。这一切听起来可能不算多。但它真的不多吗？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将占据其GDP的1/4——对最不发达国家来说甚至还不止1/4——大致相当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八轮回合所取得的成就。而且，如果多哈回合引发了辅助性的国内改革，好处将是极大的。

而服务业呢？似乎很难相信它将是多哈回合中的一大议题。主要原因是以彼此让步为基础进行谈判是很难真正令服务业自由化的——欧盟的经历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作了15年的不懈努力，欧盟国家在彼此让步为基础开放国内服务市场方面仍然进展甚微。

不过，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谈判可能有所帮助。目

前，这些谈判狭隘地侧重于商品贸易的关税问题。应该把它扩大到包含与贸易相关的一系列广泛的服务：物流、运输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的电信服务。降低所有这些服务的运营成本将等同于削减贸易壁垒，按照以下交换条件创造类似的机遇：发展中国家将降低自身的贸易成本（部分依靠国际援助，例如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获得的援助），而发达国家的服务商将获准进入发展中国家新的服务市场。

现实主义需要“宏伟构想”

如果国际社会希望避免多哈回合出现进展过于缓慢、继而停顿、最终倒退的现象，它就需要一个“宏伟构想”——一个目光长远、能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发挥领导作用的构想。首先，宣布这个宏伟构想中的一系列回合预计将取得的成果，将有助于避免过分吹嘘某个回合的成果的危险趋势。过去十年来，既得的保护主义利益轻易就能援引无数被赞美过誉的乌拉圭回合在农业领域取得的成果的官方讲话。欧洲农场主已经相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所有的困难都是乌拉圭回合造成的——尽管事实是，自80年代末以来欧洲农业保护的总体水平几乎丝毫未变（这反映出乌拉圭回合在农业自由化方面效果有限）。

当然，“宏伟构想”将需要新兴贸易大国——例如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做出很多努力，它们必须在今后几年里完成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从上世纪80年代的强烈反对多边贸易体系变成21世纪头十年中该体系明确无误的领袖。它们必须让其他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大多将来自其自身的自由化。新兴贸易大国是惟一能够这么做并且受到信赖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对多边贸易体系的长期信用如此至关重要。

美国和欧盟应该推动这种变革的发生。它们应该清除自身的（往往是令人难以容忍的）保护主义集团。它们应该在特殊和歧视性待遇问题上提供帮助——尤其是但不限于涉及最贫困国家的事宜。它们还可以迅速让新兴贸易大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它们可以邀请十多个新兴国家参与8国集团首脑会议，创造一个在贸易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的“8国+集团”（国家元首级的）。这样的集团是我们惟一可想像的能为世界制订一个合理的宏伟构想的论坛。

Patrick A. Messerlin，巴黎政治研究所经济学教授、Groupe d'Economie Mondiale de Sciences Po 董事长。他还与Ernesto Zedillo一道，担任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项目贸易和金融工作组的主席。

优惠削减： 导致恐慌吗？

Katerina Alexandraki

依赖于一组
产品的一些
脆弱经济体
面临着贸易
优惠削减的
最大风险

2004年夏天，世界贸易组织(WTO)的147个成员通过了一项框架协议，为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注入了新的动力——自2003年坎昆谈判失败之后，多边贸易谈判前进的势头已经减弱。与此同时，它也为有关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如何分配的讨论提供了最新的背景，并使人们感到迫切需要调整政策，以便使收益最大化、痛苦最小化。

尽管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消除残存的贸易壁垒的好处，但有些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LDC)以及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ACP)的一些小岛屿经济体——仍对此心存不安。为确保它们的关切在多哈回合的最终协议中得到体现，LDC和ACP国家已共同组建了90国集团(G-90)。

利害攸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根据旨在促进穷国的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优惠方案，90国集团大多数成员国的出口商品已经拥有免关税进入主要市场——例如欧盟和美国——的权利。这意味着它们从全球范围内进一步的市场准入中将获益甚微。更重要的是，多边取消贸易壁垒将削弱贸易优惠地位带来的价格优势，使出口依赖于这一优势的国家面临来自成本效益更高的供应商的激烈竞争。

因此，“优惠削减”成为完成多哈回合的一道障碍也就不足为奇了。90

国集团呼吁采取补救措施，其中包括补偿性和其他机制（例如增进出口的举措）；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来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多种经营，发展符合技术和卫生标准的系统；以及在将这些标准应用于90国集团出口时放宽尺度。它还呼吁WTO成员国不要采取进一步削减优惠的措施，以便贸易产品种类有限的受惠国继续受益，在全球市场上占据“公平合理”的份额。

优惠削减也会在多边框架之外发生——例如，出口伙伴国取消优惠、扩大受惠国范围或单方面减少最惠国关税而不相应地降低优惠关税等等。正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ACP国家反对欧盟最近的香蕉和糖进口关税改革计划。欧盟的改革计划旨在逐步废除这些产品的高贸易壁垒。

究竟有多少国家会因优惠削减受到沉重打击，打击又会有多重呢？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试图量化优惠待遇的“价值”，评估优惠削减对中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将之定义为年均国民总收入为766—9385美元的国家）的影响。我们依据一项简单的局部均衡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示，总体而言这种影响可能较小，但问题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受惠国上，它们大多依赖为数更少的几种产品（糖、香蕉以及——在小得多的程度上——纺织品）的小的岛屿经济体。纺织品的重要性



相对较小，这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并未考虑根据纺织品和服装协定的规定2004年底纺织品配额取消所带来的影响，仅仅考虑了受惠的纺织品出口方从较低关税中得到的经济收益。

此前，由 Arvind Subramanian 撰写的一篇专门研究低收入国家的论文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即优惠削减只会对少数出口严重依赖于范围极窄的一组产品（主要是烟草、纺织品、水产品 and 可可粉）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任何解决办法都必须恰好针对这些面临危险的国家和行业。

量化脆弱程度

为什么有些国家容易因优惠削减而遭受打击呢？脆弱是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对给予优惠的贸易伙伴的出口依赖程度、能享受的优

惠幅度、出口产品集中程度以及对优惠的利用水平等。此外，一个国家经济环境是否健康以及依赖于优惠条件的产业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程度也是关键因素。

对一个国家来讲，出口越依赖于提供优惠的贸易伙伴国，它就越容易因优惠削减而受损害。大约有 1/5 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出口的 75% 以上是面向加拿大、欧盟、日本和美国，也就是所谓的“四方集团”。与此同时，这些中等收入国家有资格享受非常优惠的市场准入条款。此外，还有 1/3 的中等收入国家其 50%—75% 的出口是面向“四方集团”，尽管这一组国家中有些享受的优惠不如第一组那么大。

优惠待遇创造的价值越高，受惠国因优惠削减而遭受的损失就越大。这种价值可以通过计算“优惠幅度”——受惠国由于能够享受优惠安排，在某种特定商品上获得的贸易加权的平均单位价格超出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出口商获得的价格的百分数——来量化。优惠安排的一些例子包括欧盟与 ACP 国家签署的科托努协议、美国的非洲发展和机遇法、日本的普遍优惠制度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洲—地中海协会协议》等与四方集团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这些安排，贸易优惠的形式可以是较低的关税、更大的配额或者更宽松的原产地规则（它决定了某种产品若要享受贸易准入优惠，在生产中可以使用多少廉价的外国投入品）。由于优惠形式并不仅限于低关税，某个优惠安排的优惠幅度将因生产商而异，具体数值取决于市场结构和生产商的成本函数——效率高的生产商优惠幅度较低，因为它们能够按较低的最惠国价格向世界市场出口具有竞争力的数量更多的商品。

“优惠幅度”这一概念为根据各国易受优惠削减影响的程度进行排名提供了明确的工具。它也使得在一组特定前提条件下，简化对优惠削减的定义成为可能。简化后的定义为：受惠国由于某贸易伙伴根据最惠国规定将进口自由化，在该贸易伙伴市场上平均单位价格的下降。

这其中的两个前提条件是，能享受优惠的各类产品全都充分利用了优惠安排，而且优惠性准入带来的所有经济效益全都由出口方得到。这两个条件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出口方产品的售价。例

如，假如优惠安排未得到充分利用——由于未能意识到某个特定安排的存在或缺乏足够的管理能力来执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等——实际得到的平均单价将低于根据充分利用假定做出的预测。这往往会降低一个国家的优惠幅度。

我们还假定，出口供应对价格变化做出的反应是恒定的。这是对现实过于简单化的一种假定，可能导致低估优惠削减对一个国家的潜在损害。这其中的原因是，考虑到固定成本、国家补贴、国内价格刚性及土地限制等因素，出口供应的变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价格左右。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小市场中，优惠削减导致的一次孤立的降价可能引发该行业的主要公司倒闭，造成比我们简单的全国情况模拟所预计的更为严重的出口损失。

最后，我们假定提供优惠的国家其贸易政策体制中的变化不会导致全球价格的改变。通常情况下这是不成立的，尤其当这些国家是大国时。根据这些国家对每种商品的进口弹性不同，关税降低应该能够不同程度地拉动其需求，使全球价格面临上涨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这往往会抵消受惠国因优惠幅度减小而遭遇的价格下降。与此同时，价格上涨的幅度也取决于效率更高的生产商的供应弹性和世界市场中竞争的激烈程度。

最脆弱者

哪些国家最容易因优惠削减遭受打击呢？我们的结果显示，对若干国家，尤其是小的岛国经济体，优惠具有重大意义（见图1）。特别是对毛里求斯、圣卢西亚、伯利兹、圣基茨和尼维斯、圭亚那和斐济这6个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优惠使其出口值增加了大约1/4甚至更多。糖和香蕉贸易优惠的意义极为重大，引人注目。这两种产品加起来占到了受益最大的几个国家所获优惠总额的3/4。纺织品和服装排在远远的第三位，其他产品平均而言只占很小的份额。

假定由于四方集团推行的最惠国贸易自由化使每个国家的优惠幅度都减少了40%，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评估优惠削减对出口收益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即便出口供应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受价格改变影响，仍有几个国家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图2）。每个国家实际的优惠削减幅度将由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决定，实际幅度与我们假定的40%相差越大，受影响的程度偏离也越大。不过，最惠国关税的任何调整以及随之而来的优惠削减都不太可能立即兑现。以现实的观点来看，关税调整将历时多年，受惠国出口在任何一年里所受到的影响都会小得多。

鉴于其较大的优惠幅度，毛里求斯毫不令人意外地成为受优惠削减影响最大的国家，这主要因为它向欧盟出口的糖享受着极其优惠的条件。圣卢西亚是另一个受影响很大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香蕉在其总出口额中占据很大比重，以及它从欧盟得到了非常大的优惠。事实上，在10个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中，除塞舌尔之外，其余国家之所以易受影响，都是因为给予糖和香蕉贸易的优惠。塞舌尔容易受影响是因为其渔类产品享有优先进入欧盟市场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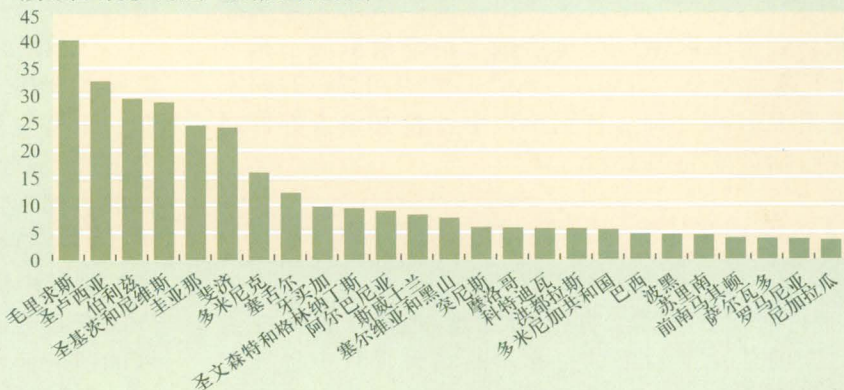
商品出口受到的重大冲击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变成重大的宏观经济冲击，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内的宏观经济脆弱程度，而后者则源自较高的债务对GDP的比率、不灵活的劳务市场或汇率制度僵化等问题。在理论上，政府可以通过向受冲击的经济部门提供转移支付等方法对冲击作出反应，但在实践中，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给已经极高的债务对GDP的比率雪上加霜的话，这可能不是一种行得通的选择。实际上，在最容易受优惠削减影响的国家中，有些债务对GDP的比率高达100%以上，比如多米尼加、牙买加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而塞舌尔和圭亚那的负债总额几乎达到其GDP的两倍。有些国

图1

优惠状况

就6个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优惠使其出口额增加了20%以上。

（贸易准入优惠导致出口额增加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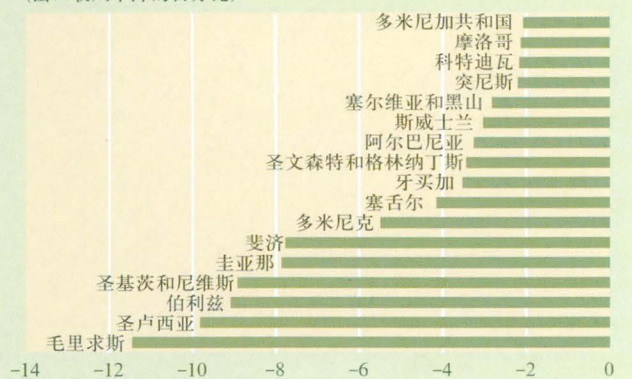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图2

岛国受到的冲击最大

优惠幅度减少40%可导致出口收入较大幅度的下降。

(出口收入下降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家不灵活的汇率制度可能导致更大的刚性。

补救建议

90国集团有理由敲响警钟吗？我们的研究表明，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补充的是，问题主要集中在少数依赖于数量甚至更少的产品的国家身上。因此，制订对策时应该针对这些国家和行业——尤其要注意欧盟和美国特定产品（例如糖、香蕉或渔类产品）贸易体制的变化，无论它们是否发生在多边自由化的进程之内。

决策者还必须斟酌给予最脆弱国家的几种不同类型的支持的利弊。不同的利害相关方提出的建议包括为受到影响的受惠国建立一项基金，为其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调整——例如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促进中小企业和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等——提供资金。英联邦秘书处对易受影响的小经济体的研究已发出呼吁，希望对这些国家采用更为宽松的贸易标准和原产地规则，使它们免于履行多哈回合有关出口补贴的条款，并为能抵消优惠削减造成的出口损失的倡议提供资助。

至于IMF，它于2004年4月批准了一项新的融资政策——贸易一体化机制，它旨在为因第三国的MFN自由化而遭遇始料未及的国际收支压力的国家提供额外的保障，优惠削减则是这种压力可能的来源之一。

给予特别脆弱的欠发达经济体以特殊待遇这种想法在WTO已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但是，对成员

资格进一步细分（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外再作划分）的尝试迄今为止并不成功。细分的动机来自这一事实：90国集团的许多成员国往往是小的岛屿经济体，深受以下问题困扰：生产上的规模不经济、有限的基础设施以及极易受不利的外部冲击影响。另外，可供发展的更具竞争性的替代产业也并不容易找到。

但是，完全取消对这些国家出口的所有贸易壁垒、给予其永久性的优惠待遇也是引人争议的，这是因为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有关优惠安排给受惠国本身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成本的文献仍然没有定论。目前据称单边优惠的理由是这能够鼓励出口型经济的发展，但很少有实证证明它们是成功的。而且，这样做的代价也不菲，包括资源分配中的激励扭曲、贸易自由化失去动力、处理文件和原产地规则的行政负担等等。此外，优惠的无限期延长只会将问题的解决推迟，并继续成为未来进一步多边自由化的绊脚石。

第二，对某一组发展中国家给予优惠一般来说都是以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代价的，因为后者不能享受同样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例如，根据科托努协议，ACP国家的香蕉在欧盟市场上享受极为优惠的市场准入，而厄瓜多尔和洪都拉斯的香蕉在欧盟市场上面临比ACP国家高得多的贸易壁垒。这就使人对贸易优惠存在的理由产生疑问，因为对发展的促进没有理由因为国别的不同而善待某些穷人、歧视另一些穷人。

前进需要有关各方都采取行动。WTO去年7月份框架协议的内容明确提到优惠削减，指出它是多哈回合中应予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解决办法应该是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非歧视性的体制之内，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使所有参与者融入全球经济中。帮助实力更强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开放贸易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会为南南贸易创造机遇（南南贸易的益处很大程度上还有待挖掘）。这样的话，它就能扩大市场机遇、拉动世界需求以改善贸易条件，从而帮助减轻优惠削减对易受打击国家的负面影响。

Katerina Alexandraki，IMF政策制定与检查部的经济学家。本文是建立在作者与Hans Peter Lankes的研究论文《优惠削减对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影响》[IMF工作文件04/160（华盛顿）]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Subramanian, Arvind, 2003, "Financing of Losses from Preference Erosion,"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TF/COH/14 (Geneva).



援助 与调整同行

Stephen Tokarick

对于将会受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严重打击的少数国家来讲，特定的融资框架是必需的。

如果能够达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以及其他机构所估算出来的全球福利收益 1250 亿美元的期望值，那么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早就在多边贸易改革议程上占有重要地位了。最大的净受益方将是那些富裕的国家，它们的贸易壁垒最大。不过，发展中国家也能从发达国家强加在农产品上的补贴与关税的废除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这些农业援助——其中包括进口关税、税率配额、对农民的直接支付以及在产量、投入与出口方面的补贴——冲击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从而减少了它们的出口利润。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担忧，如果它们继续进口发达国家当前给予补贴的产品，诸如小麦，它们同样会遭受失败。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否会增加进口成本，从而导致潜在的、易受攻击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在进口这些产品时，需要外部的金融资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作为

自由化的结果，尽管一些贫穷的国家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进口支出，但是这些增长的规模基本上是很小的。然而，对于一小部分国家来讲，这种增长则是非常大的。

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如果说发达国家不再援助农产品将会影响到其他国家，那么它的主要表现是，之前受保护的产品的国际价格将上涨。这些产品的净出口国将因为贸易条件的改变而获益：它们将从国际价格的上涨中受益，并出口更多。另一方面，净进口国由于不得不为其农产品的进口支付更高的价格，一般来说就成了输家。在这些国家中，自由化将对不同的群体产生完全相反的影响，它使生产者获益，而使消费者受到伤害。从整体平衡来看，净进口国消费者的损失超过了生产者的利润，因而总体来说，它们的情况将会不断恶化。然而，对于净出口国来讲，生

照片显示的是美国西部收割小麦的场景。

产者的利润将超过消费者的损失。

然而，农产品净进口国并不是惟一的输家。那些从出口特惠准入中获益的农产品净出口国，由于贸易自由化有可能会破坏这些出口特惠的价值，从而受到伤害。譬如，非洲、加勒比海以及太平洋的国家在出口到欧盟的特定产品上享受的特惠准入。如果贸易壁垒减少，这些国家在欧盟市场中相对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优势”也就减少了。

不过，这类有关谁将会赢，谁又将会输的预测过于简单，必须进行深入探讨。这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贸易自由化，如果之前受到保护的产品的国际价格上涨的够高，曾是净进口的国家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净出口国。如果一项产品的国际价格较高，一国有可能通过减少消费从而减少进口量，同时增加该产品的国内产量。关键的问题在于国际价格的增长幅度是否够大，从而转变该国的净贸易取向。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改变其贸易取向并非没有先例。仅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就有一些国家已经在这么做了。

其次，各国可能会制订与其农业部门进行复杂互动的政策措施（即扭曲）。举一个现实世界的例子，一些农产品净进口国为了援助贫困人口，而对其粮食原材料进行补贴，诸如面包消费。这种补贴使得面包的消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国际价格与当前较低的国内价格之间的差价需要由政府来填补。如果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废除它们对于小麦的援助，国际价格将会上扬。

这种情况对于补贴面包的国家会有什么影响呢？假定给予的补贴是国际价格的一个固定比例，面包的消费价格将会上涨，虽然这种价格仍然会低于国际价格。然而，由于价格上涨，面包的消费（也就是进口）将会下降，政府的支出也会减少，从而使整个国家获益。所以，这个例子中的小麦的国际价格上升的净福利效应，主要取决于补贴支出的减少与面包价格的增长给消费者所带来的损失大小的对比。相反，如果面包的价格被控制在国际价格之下的一个固定水平，国际价格的增长将减少进口国的福利，因为国际价格与被控制的价格之间的差距将被拉大，而消费的数量仍然保持不变，因此政府的补贴支出将增加。这种额外的支出需要筹集资金，也许通过在该经济体某处收取更高的税收来实现。

净进口国？净出口国？

在自由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取向如何？——它们将选择市场的哪一边？McCalla 与 Valdes 在1999年做了一项重要研究，他们利用1997年的数据，

根据各国的收入以及在粮食与更大范围的农产品上的贸易取向，对148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取向作了分类。他们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见表1）：

- 在148个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国家（105）都是粮食净进口国，只有43个国家属于粮食净出口国。在63个低收入国家中，大部分（48）都是粮食净进口国，只有15个是粮食净出口国。

- 在更为宽泛的农产品上，呈现出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在148个发展中国家中，85个为农产品净进口国，63个为净出口国——与粮食贸易相比，差距小了很多。在63个低收入国家中，小部分（33）的国家属于农产品出口国。

- 从表中可以看出，有22个国家既是粮食净进口国，又是农产品净出口国。只有2个国家既是粮食净出口国，又是农产品净进口国。

因此，在就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影响进行评估时，我们必须对严格的粮食贸易自由化与所有农产品（包括棉花，一种非粮食农产品，对一些贫穷国家来说拥有出口利益）贸易自由化之间进行区分。

表1

食品与农产品¹

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是食品净进口国……

	低 收入	中等 收入	上中等 收入	发展中 国家总数
食品净进口国	48	35	22	105
食品净出口国	15	17	11	43
总数	63	52	33	148

不过，小部分低收入国家属于农产品净出口国。

	低 收入	中等 收入	上中等 收入	发展中 国家总数
农产品净进口国	30	32	23	85
农产品净出口国	33	20	10	63
总数	63	52	33	148

许多发展中国家既是食品净进口国，也是农产品净出口国。

	食品 净进口国	食品 净出口国	发展中 国家总数
农产品净进口国	83	2	85
农产品净出口国	22	41	63
总数	105	43	148

资料来源：McCalla 和 Valdes (1999)

¹ 基于以下的一项研究：利用1997年的数据，根据各国的收入以及在食品与其他农产品上的贸易取向，对148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

启动自由化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粮食与非粮食——将对粮食净进口国的进口支出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在之前的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之前，粮食净进口国坚持建立一个金融机制，解决那些可能由于国际价格的升高导致的，起因于自由化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将其归为粮食净进口国的 79 个国家的进口支出为基础，估计了贸易自由化对于 10 种商品（牛肉、棉花、玉米、奶制品、大米、羊肉、大豆、糖、小麦与毛纺织品）的影响。在进行计算时，我们考虑了由于发达国家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国际价格将产生的变化，并对净进口国将因此产生的贸易量的变化进行了计算。

我们发现，对所有的粮食净进口国来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不会增加进口成本。尽管在 79 个国家中，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谷类（小麦与玉米）的净进口国，部分国家同时也是其他受援助商品的出口国，如棉花、精制糖与大米。以科特迪瓦、巴基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为例，由于废除对这 10 种商品的援助而获得的出口收益，实际上可以抵消这 10 种商品进口成本的增长。限制谷类的贸易自由化，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将面临更高的进口成本。

接着，我们又发现，尽管这 79 个国家都是粮食净进口国，在不同的商品上他们采取的贸易取向各有不同。研究结果表明，某些地区的部分国家（主要是中东与北非）将会在谷类（小麦与玉米）的贸易自由化中受到伤害。在这两种商品贸易自由化之后，进口支出增长最大的将是埃及（1140 万美元）、墨西哥（670 万美元）、摩洛哥（570 万美元）、菲律宾（430 万美元）、叙利亚（360 万美元）以及俄罗斯（320 万美元）。许多小型岛国，包括马尔代夫、萨摩亚、斯里兰卡、加勒比海东部群岛、佛得角、塞舌尔、汤加以及委内瑞拉、菲律宾、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新加坡，进口成本将以百分比形式呈相对较大幅度的增长，显示出它们对于谷类进口的依赖。

我们还发现，对于大多数在这 10 种商品上的进口支出将会增加的国家来说，这种增长将少于受其影响的进口总量的 4%，不过有 9 个国家的增长将超过 1000 万美元。6 个国家——萨摩亚、老挝、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黎巴嫩以及马尔代夫——的进口成本的增长将超过受影响进口总量的 3%（见表 2），反映出它们对于进口农产品的依赖。尽管一些国家进口成本将会增长 1000—3000 万美元，不过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进口在进口总量中并不占据重要份额。因此，对这些国家

表 2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成本有多大？

进口支出的最大增长将可能出现在那些依赖于进口食品的小型岛国中。

进口成本增长最多的国家 ¹			
(2000 年的百万美元)		(占受影响进口量的百分比)	
沙特阿拉伯	35.4	萨摩亚	3.8
菲律宾	29.6	老挝	3.7
墨西哥	20.2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3.1
俄罗斯	15.6	多米尼加	3.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3.2	黎巴嫩	3.0
委内瑞拉	12.1	马尔代夫	3.0
新加坡	11.7	圣基茨与尼维斯	2.9
孟加拉国	11.7	圣卢西亚	2.8
尼日利亚	11.3	斯里兰卡	2.8
斯里兰卡	9.3	汤加	2.7

资料来源: Tokarick (2003)。

¹ 基于贸易自由化对于 10 种农产品影响的估计，这些估计以世界贸易组织 (WTO) 划归为食品净进口国的 79 个国家的进口支出为基础。

而言，自由化不太可能需要特殊的外部筹资。这 10 种受影响的产品的进口支出占进口价值的百分比的最大增长，可能将会出现在那些依赖于粮食进口的小型岛国中。从广义来说，这些发现与 Eiteljörge 和 Shiells (1995) 的结论相似。根据他们的计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6 年之内净进口国的进口支出将平均上升不到 4%。

从当前的研究来看，自由化之后紧随着的牛奶制品以及其他奶制品国际价格的飙升，给粮食净进口国的进口成本增长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国家中许多都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对许多粮食净进口国来说，牛奶进口成本的增加在整个进口成本的增长中占了 3/4 强。

推进自由化发展

农产品贸易由于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援助措施，而被严重扭曲。显然，废除这些措施将使国际贸易系统更加有效，从而使许多国家能够从中受益。不过，作为贸易自由化的结果之一，一些国家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于农产品进口的国家。

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发现阻碍农产品自由化的进程——也不应该如某些人所争辩的，采用可替代的方法，免除特定敏感产品如牛奶的贸易自由化承诺。对大多数国家来讲，控制实施贸易自由化之后的进口成本的增长规模是可能的。少量进口成本有极大增长的国家，多为必须进口大量农产品的小型岛国。而且，尽管由于自由化，许多贫穷国家也许必须为进口粮食支出更多，这些支出的一部分可以被自由化的非粮食农产品所抵消。

譬如，如果发达国家打算废除对其棉花部门的援助，那么这将导致世界棉花价格的提高，从而增加非洲

西部与中亚许多棉花净出口贫困国家的出口收入。这能部分地抵消这些贫穷国家由于粮食产品自由化而承担的额外增加的粮食进口成本。在棉花自由化之后,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马里、巴基斯坦、叙利亚以及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将从出口收入中获得巨大的收益。由于在很多情况下,进口那些受援助较多的农产品的国家,同时也是其他一些受保护产品的出口国,因此贸易的结构将使更多的国家免于受到伤害。

然而,这种结果的确表明了,随着贸易的自由化,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赔偿机制的建立,从而使全面的自由化对所有的团体更具吸引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贸易一体化机制(TIM)可以帮助各国进行与贸易相关的调整。它是在多哈回合谈判的一个适当时机出现的,填补了自从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就存在的一个空白。贸易一体化机制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新机构,而是一种使金融资源的获得更易于预测的政策。贸易一体化机制着眼于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即由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收支不平衡也许将会出现,从而阻碍它们进行自由化。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非常必要的,应该鼓励这种自由化,但这种自由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Stephen Tokarick,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主要基于他的一篇IMF工作报告03/191,《部分与整体均衡情况下对农产品贸易扭曲的影响的计量》。在即将出版的《世界经济》中将会有一篇有关该文的技术性更强的版本。

参考文献:

Eiteljörge, Uwe, and Clinton Shiells, 1995, "The Uruguay Round and Net Food Importers," IMF Working Paper 95/143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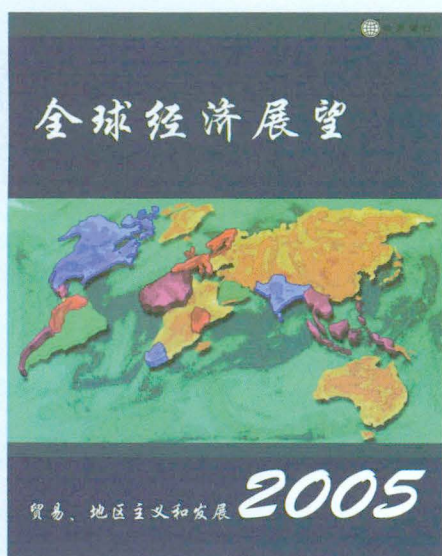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2002: "How Do Industrial Country Agricultural Policies Affect Developing Countries?" pp. 81-91 (Washington).

McCalla, Alex, and Alberto Valdes, 1999, "Issues, Interests, and Optio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presented at a joint World Bank/WTO 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and the New Trade Agenda in the WTO 2000 Negotiations, October 1-2, 1999, Geneva, Switzerl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2, "WTO List of Net Food Im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Marrakesh Ministerial Decision on Measures Concerning the Possibl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Reform Programme on Least-Developed and Net Food Importing Countries ('The Decision'),"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G/AG/5/Rev. 5 (March).

世界银行最新图书——《全球经济展望》

中文版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地区贸易协定的不断涌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贸易的前景。但是,地区贸易协定的形成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成员方的发展?是否会对多边贸易体系造成危险?

本报告认为,地区贸易协定带来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由于关税的降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服务贸易竞争的加强,减少了贸易成本——地区贸易协定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尽管地区贸易协定被证明对成员方有益,但是对于非成员方而言则会产生不利影响。各国对多哈议程的履行将降低这种与地区贸易协定有关的贸易转移风险,减少地区贸易协定以外国家的损失。

书号: ISBN 7-5005-8060-6 定价: 40.00 元

订购电话: 010-88190414 88190406 联系人: 蒋鹏飞
E-mail: shijingbook@yahoo.com.cn

如何通过更自由的贸易帮助摆脱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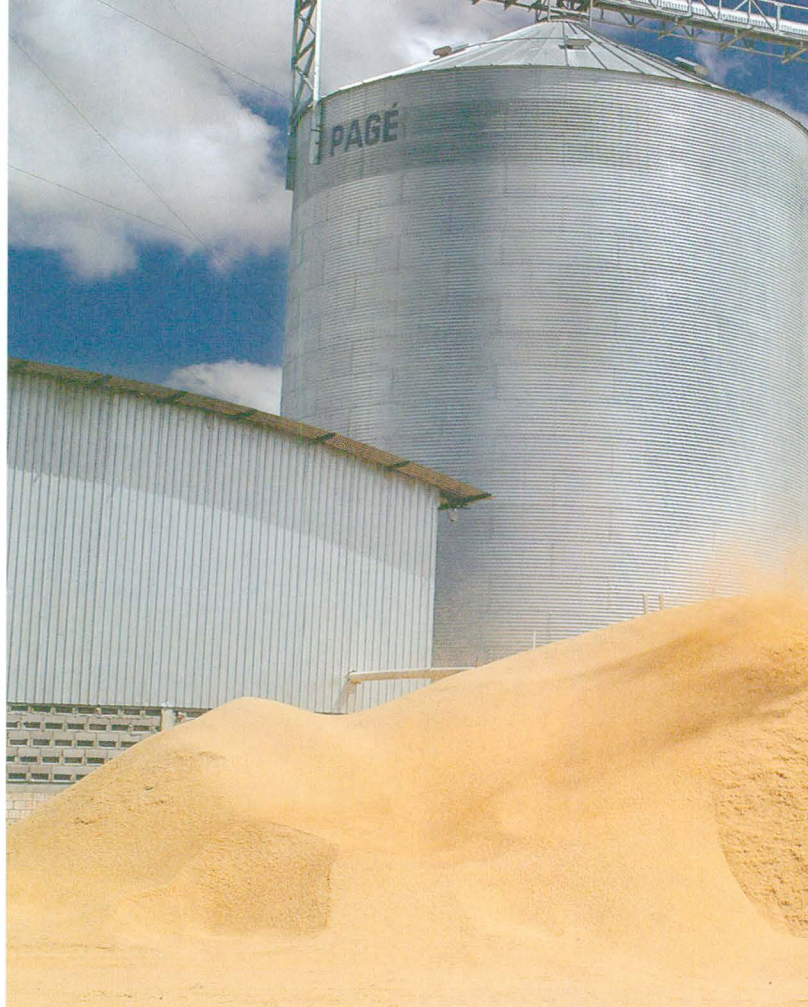
——通过减少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减轻世界饥饿的议程

John Nash 和 Donald Mitchell

乍看之下，贸易政策似乎不太像是对付饥饿的理想工具。不过，根除昂贵的保护主义壁垒则是将粮食摆在贫困人口餐桌上最好的方法之一。整个世界所生产出来的粮食足够喂饱全世界所有人还绰绰有余。然而，大约8.4亿人口，或者说几乎世界人口的1/6，仍然营养不良。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大约92%——长期营养不良，更甚于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期占据头条的急性饥荒。

其部分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被这样的想法所困扰，即他们都认为获得粮食保障最好的方式在于增加国内粮食产量，而不是增加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当务之急，由于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高而无度的扶持而加剧。这种扶持导致了全球粮食市场的巨大扭曲（见2004年9月《金融与发展》的“picture this”专栏）。无论是在各国的国内政策，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中，这种扭曲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产生巨大成本。

全球贸易自由化只是应付饥饿的众多方法之一，不过，它能在为实施贸易保护国家提供更便宜的粮食、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帮助数百万人口脱贫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多哈回合协议有必要降低富裕与贫穷国家之间食品贸易壁垒的原因之一。本



文检验了如何利用贸易政策帮助减少贫穷和减轻饥荒，并勾勒出了一个减轻发展中国家粮食保障缺乏情形的议程。

增加产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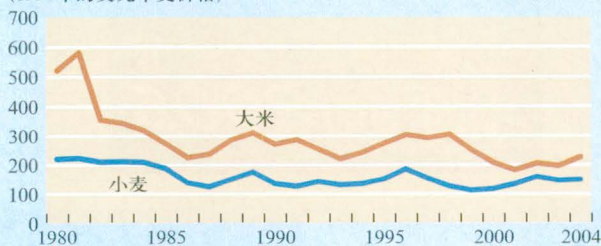
粮食生产、储存与出口能力并不是营养不良的根本问题。由于全球生产过剩，过去25年以来谷类价格有所下降。尽管用于进行谷类生产的全球农田数量有所减少，尤其是在5个最大的出口地区——美国、欧

图1

更便宜的粮食

自1980年以来，谷类实际价格有了急剧下降。

(1990年的美元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发展展望小组。



巴西的大米储藏仓

的更为有效方法（如增加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研究与技术支持等支出）的替代品。这阻碍了他们对能增强他们对于粮食危机的快速应变能力的有效粮食分配系统进行的投资。模拟显示，把源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消费隐性税收置换成同等的显性税收，并对农业研究进行财政投入，将对雇佣、收入与消费，尤其是粮食消费的增加大有益处（Diaz-Bonilla 等，2003）。

贸易保护主义还间接地鼓励农民继续种植低价值的粮食和农作物，而不是将其引至多元化的高价值、非传统产品的出口。而后者是一种较好的提高收入和摆脱贫困的方式。反过来，出口产品的匮乏降低了该国赚取外汇的能力，并破坏了其进口粮食与其他产品的结构。当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强加进口关税来保护他们的粮食以及农作物时，他们就有效地建立起了对南—南贸易的高壁垒。因此，尽管进口关税低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采取临时的限制保护措施，总的来说，粮食的贸易壁垒使得贫困的消费者获得的粮食保障更少，长期来看，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对公共与私人投资资源更为有效利用的破坏，从而引发其他国家相应的贸易保护，即使是生产者的短期利益也将减少。

在对长期的粮食缺乏保障之外，还有一个对于因人为或自然灾害而造成的短暂粮食供应破坏的合理关注，有时候这被用于证明某些刺激国内粮食生产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合法性。然而，这些破坏的影响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减轻，如进行适当的现金或类似的储备、改善分配渠道、改革粮食扶持。与刺激粮食生产相比，这些措施将更为有效，花费亦较少。在国际价格较高时，当由于出口国方面的原因造成对出

盟（EU）、加拿大、澳大利亚与阿根廷——小麦的实际价格下降了大约34%，大米的价格则下降了大约60%（见图1）。某些曾遭受过多年干旱的地区由于具有较高的产量与较好的生长条件，2004/2005年农事年世界谷类产量有望增加8%，是26年来同期最高增长比率。由于相应的消费增长只有2%，产量的剧增将会带来更高的谷类储量。

尽管全球粮食供应充足，但由于世界价格相对较低，许多国家在粮食上强加进口关税，从而鼓励并保护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这么做，但后者承担了更多的冲击成本，这些成本既有他们自己的贸易保护政策的，也有来自于富裕国家的。粮食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国内粮食价格的升高，从而主要伤害到贫困的消费者，让他们的粮食花费所占比例过高。贸易保护主义在使农村贫困人口获益时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它忽略了两大团体：没有农田但作为消费者必须支付更高价格的人口以及拥有农田却不为商业目的生产的人口。即使是那些商业性的农民，他们的收入虽然在短期会有所增长，但并不会产生长久的利益，如与非农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急剧缩小。这种情况只有通过采取提高农业生产力以及促进劳动力流动的措施才能得以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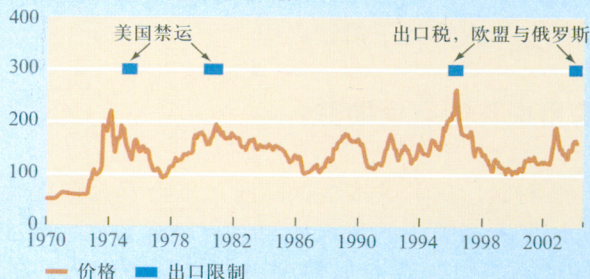
政策制定者往往将贸易保护主义看做是扶持农业

图2

关上大门

在全球粮食价格到达峰值的时候，主要的出口国有时会强加出口控制。

（美国小麦的名义价格，美元/吨）



资料来源：美国农业部与世界银行。

口的限制（见图2）时，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寻求在多哈协议中对这些行为进行限制。

关注收入的提高

长期的粮食缺乏保障主要来自于贫困人口购买力的不足，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为贫困人口提供赚取充分收入的机会，从而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不管他们是通过国内生产或国外生产的粮食来满足这些需求。在此，贸易自由化能产生很大影响，因为它将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开放市场。这不仅使其产品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还能购买更好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反过来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生产力，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不过，这需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强有力的承诺，从而在多哈贸易谈判中实现全面自由化。一个成功的多哈回合谈判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收益，并将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世界银行，2003）。然而，在多哈谈判中，有关粮食保障的讨论仍然集中于国内生产上，反映在谈判立场中，即发展中国家——或者一些小的团体，如粮食净进口国——要求有更多的弹性，并免除一般义务，从而能让他们以“特殊产品”的名义，或者作为“发展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维持粮食产品高度地进入壁垒。

对于国内生产的关注可能是对过去的一种延续，当全球粮食分配系统欠发达的时候，粮食进口主要是那些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责任；而当粮食进口变得非常有必要的时候，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创造出外汇短缺的幽灵。但在当前的环境下，我们的战略目标应为减少贫困，而不是增加国内粮食产量。尽管一个全面的解决饥饿问题的战略需要许多元素，包括营养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安全网络以及其他要素，营养不良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收入（见图3）。虽然很难找到例证证明，大批人口都已经脱离贫困的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本地生产的粮食而仍然处于饥饿之中，但我们却有突出的例子表明，在国家层面上粮食自给自足的国家——甚至拥有大量的剩余储量——仍然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处于饥饿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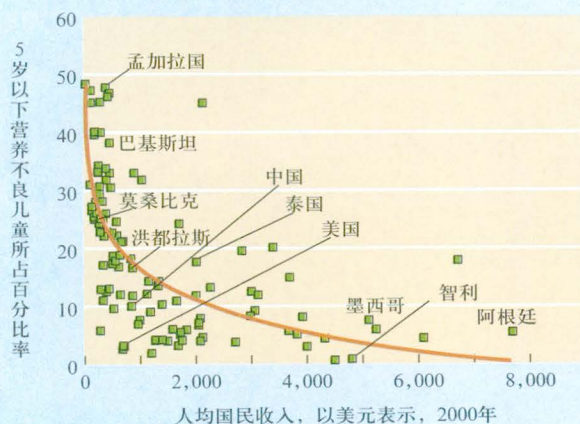
贸易自由化能有何助益？

很明显，在考虑粮食保障时，多哈贸易自由化谈判应该将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如何利用贸易体系增加自给自足的能力，转向如何利用它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此外，为了利用这一回合谈判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谈判的目标层次应逐渐提高。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采取

图3

更少的饥饿人口

平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营养不良的儿童亦较少。



资料来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世界银行员工的估计。

一些不依赖于该回合谈判的单方面措施。这项议程应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大致按照优先权顺序排列）：

- 在多哈回合谈判的协议中，所有的国家——富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承诺降低粮食与其他农产品的约束（最高限度）税率，从而极大地减少适用关税。与此同时，还应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项特殊的保障或随机保护机制，当国际价格特别低或处于进口浪潮（见后表）时可以调用。

- 各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降低粮食产品进口的适用关税，提高家庭粮食保障。为了减少对于那些仅有有限资源可以调整的小型生产者的不利影响，安全网络或过渡性的扶持机制是有必要的。虽然从原则上来说，即使在缺乏多边谈判的情况下，这些改革也是非常值得去做的，然而从实践上来看，如果已经存在一个呼吁发达国家减少补贴与保护边界的成功协议，那么这些改革在政治上则会要容易得多。

- 农村发展战略应把政策、对提高生产力的投资以及扶持服务，集中在提高农村收入并改善农业生产整体环境（包括出口）方面，而不是增加粮食产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有待增加，不过是以一种创造水平田地的方式增加。在这种农田中，农民可以做出毫无偏差的产量决策。

- 在多哈回合谈判协议下，当国际价格较高时，粮食出口国征收出口关税或进行出口控制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约束。

- 在全球生产过剩时期，富裕国家将多余的产量以粮食扶持的名义倾销给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在协议中也应加以约束，因为这将破坏当地的粮食生产与市



保护粮食安全生产的一个例证

尽管粮食安全的解决方法之一是根除进口壁垒,在国际价格特别低时,同意极力降低世界贸易组织约束关税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可以调用特殊的短期措施来保护生产。富裕国家通过各种各样的安全网络,保护他们的生产者免于遭受农业市场巨幅波动的冲击。但较为贫困的国家却没有资金这样做。因此,发展中国家将寻求其他方式,对进口替代农作物的生产者进行保护。

一种理想的情况是,这种保护应该通过直接支付来实现(该支付既与投入的多少无关,也与产出的多少无关),而不是进口关税的增加。不过,考虑到财政的现实情况,这种保护很有可能不得来源于关税。然而,在这种特殊机制下任何关税的增加都应该有时间约束,规模适当,而且只能在偶尔的情况下才使用。这些限制至少能最小化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产生的对于出口所持的固有偏见。这种对于进口替代产品没有或仅有适当保护的相对中性的贸易政策,将不会对粮食生产造成伤害。在许多国家,农民传统上是采取一种混合农作物的战略,而商业作物的生产改善了他们为其粮食生产购买现代技术的能力。因此,在商业作物收入与粮食生产之间,存在着实证正相关。这种相关在较为贫穷的国家更为强烈,在那里非农业收入更受限制。

场渠道。

- 在农业投入如种子、肥料、化学药品以及装备的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应单方面降低管制与边界壁垒。
- 在多哈回合谈判之外,发展中国家应该降低粮食产品跨国、跨地区交易的壁垒,并对减少这种贸易成本进行投资。由于对粮食供应的冲击并非与相邻国家密切相关,地区间贸易能帮助实现供应与价格的稳定。
- 全面实行全球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全球粮食价格的结构性上升,从而对贫困的消费者形成负面影响。

不过,结构性的影响将随着协议实施逐渐出现,我们应有充足的时间可以进行调整。在那些当前对粮食进口强加关税的国家,较高的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造成的影响可以通过降低关税而抵消。在其他国家,为了保护那些最容易受攻击的对象,安全网络也许是必需的。此外,国际价格的波幅将变得较小(Tyers 和 Anderson, 1992),有助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好地控制风险。尽管如此,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小组正在探索帮助贫困的消费者应对潜在的较高价格的方式。

在减少饥饿上,国际贸易体系无疑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不过,各政府与谈判专家应将眼光放远,超出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的短期影响,朝着建立一个所有人都能从身体和经济上获得充足、安全和营养的粮食的开放体系而努力。

John Nash, 世界银行农业发展部的商品和贸易顾问;
Donald Mitchell, 世界银行发展前景小组的首席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 Bruinsma, Jelle (ed.), 2003, "World Agriculture: Towards 2015/2030"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 Diaz-Bonilla, Eugenio, Xinshe Diao, and Sherman Robinson, 2003, "Thinking Inside the Boxes: Protection and Invest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Food Security Boxes," contributed paper t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gricultural Policy Reform and the WTO: Where Are We Headed?" Capri, June 23-26, 2003.
- Gisselquist, David, Carl Pray, and John Nash, 2002, "Deregulating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7, No. 2, pp. 237-65.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4, "Agricultural Outlook 2004-2013" (Paris).
- Tyers, Rodney, and Kym Anderson (eds.), 1992, "Disarray in World Food Markets: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s, 2004, "Grain: World Markets and Trade" (Washington).
- World Bank, 2003,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4: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Promise of the Doha Agenda" (Washington).

IMF 概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追踪？

《IMF 概览》追踪 IMF、全球经济以及金融发展的最新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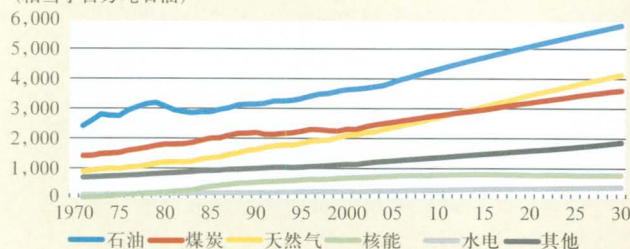
在线浏览: www.imf.org/imfsurvey

能源安全，还是不安全？

在接下来的30年中，全球能源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国际能源机构(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在其《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描绘出了一幅清楚的画面。如果各国政府坚持当前的政策，到2030年能源需求将几乎上升60%——其中需求增长的2/3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这与发展中国家更为迅速的经济与人口增长相适应。在各种能源构成中，矿物燃料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核能与可再生能源仍然有限。到2030年，天然气的消耗将几乎翻倍，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将超过煤炭的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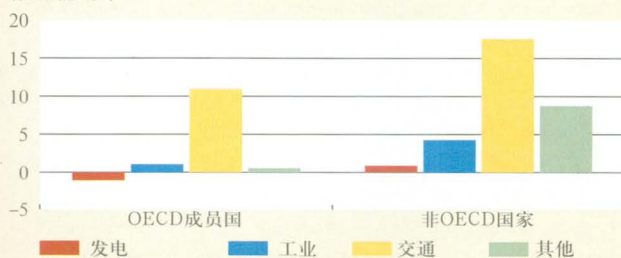
在世界主要能源的需求增长中，矿物燃料将占据大约85%。

(相当于百万吨石油)



在主要的能源构成中，石油仍然是惟一最大的组成部分，尽管其所占百分比份额将会有少量下降。在发展中国家，石油需求将继续保持最为迅速的增长。石油需求的大部分增长将来自于交通部门，尤其是OECD¹成员国。

(百万桶/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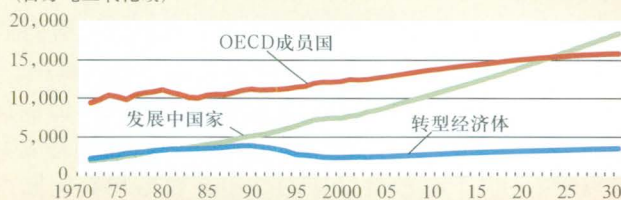


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如果各国政府不改变其政策，到2030年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增加60%以上。在过去30年中，显著下降的能源的平均含碳量将几乎不会改变。在气体排放增加量中2/3多将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将依然是煤炭这一含碳最高能源的主要使用者。

在21世纪20年代，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OECD国家。

(百万吨二氧化碳)



全球石油需求将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达到1.21亿桶/日。主要位于中东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员国，有望满足一半以上的需求——甚至比20世纪70年代更大的份额。天然气需求的增长将不得不依赖拥有大量储备的一小群国家来满足，这些国家主要是OPEC的中东成员国以及俄罗斯；后者很有可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不过，俄罗斯那些原有的超级油田的产量已经在下降，进而需要进行大量的绿地项目投资。

几乎所有世界主要能源产量的增加将都发生发达国家之外。

(相当于百万吨石油)



近年来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部门的作用有了急剧的增强，接近一些OPEC成员国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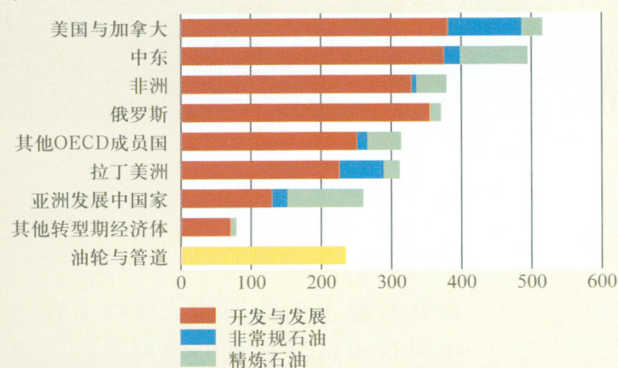
(石油与天然气部门对GDP贡献的百分比，2002年)



将世界能源转换成可供使用的供给将需要巨额的投资——在2003—2030年间可能需要大约16万亿美元，或者说每年5,680亿美元——其中一半将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生产与需求是增长最快的。电力部门需要最大的投资，大约为10万亿美元，而石油部门将需要大约3万亿美元。

石油工业预计投资的3万亿美元中的70%以上将逆流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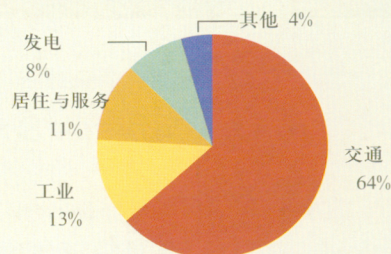
(10亿美元, 2000年)



如果各国采取了一系列高效能和对环境友好的政策，到2030年全球能源趋势将如何演变呢？《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预测，如果这样，全球能源需求将大约下降10%——最大的下降将出现在石油上，其中主要归功于促进再生能源的政策。这些节约下来的石油将相当于当前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尼日利亚产量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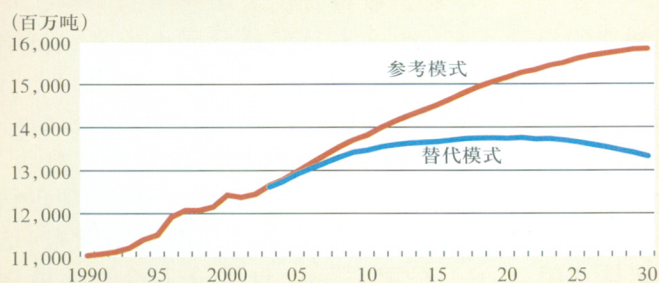
由于燃料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及使用可替代燃料的交通工具，2/3节约出来的石油将来自于交通部门。

促进再生能源的利用从而节约出来的石油=1,280万桶/日



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减少16%——大致相当于美国与加拿大当前的排放量之和。其中这些减少的60%将发生在非OECD国家。OECD成员国的排放量到21世纪20年代将逐渐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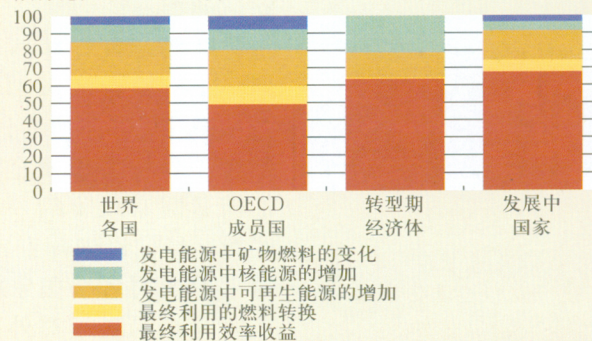
通过更为严格的能源使用效率政策与环境政策，发展中国家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于2020年开始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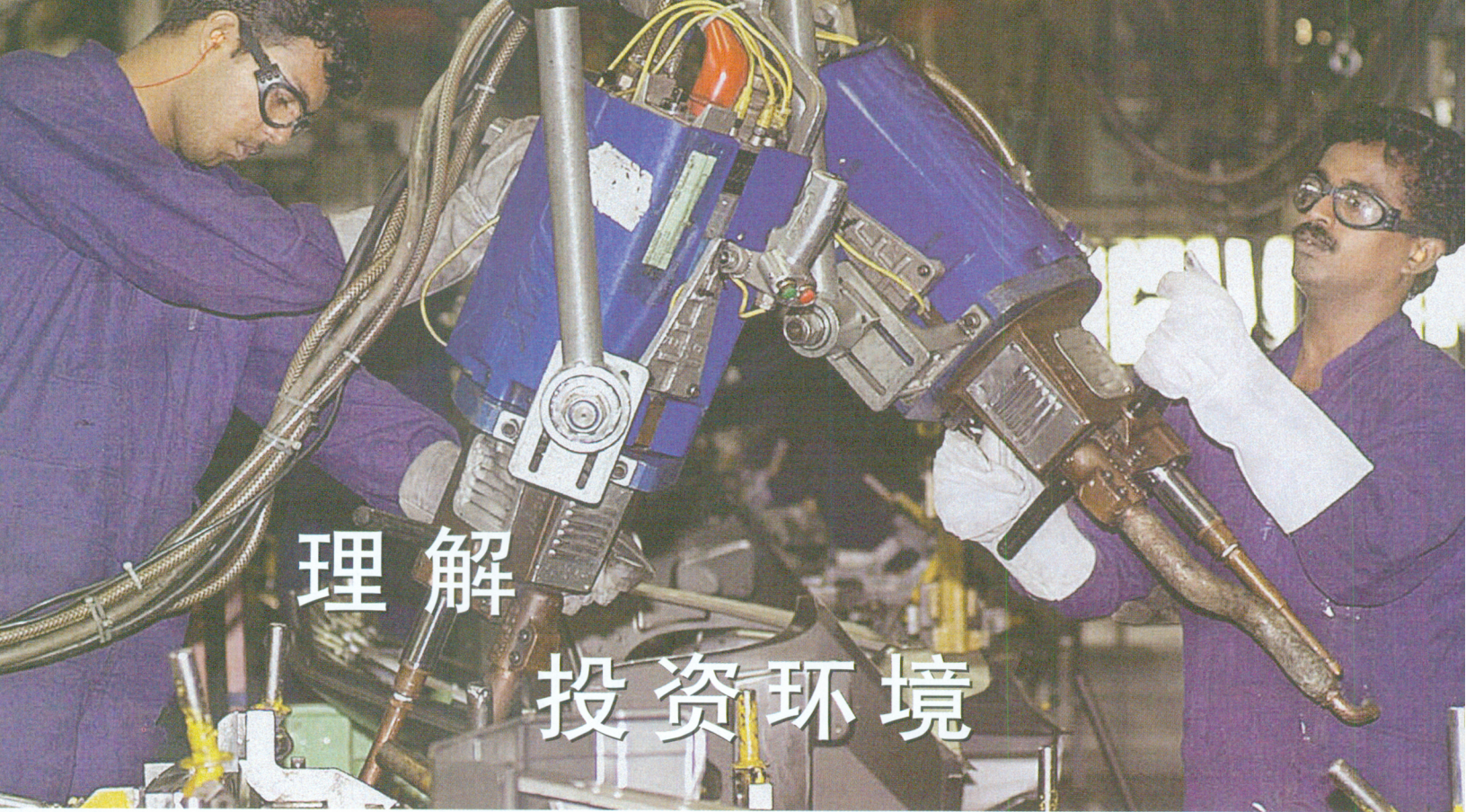
交通工具、电子器械、照明以及工业对能源更为有效地利用，将占到排放减少量的一半以上。发电所用能源开始转向采用再生能源，并且核能将占据排放减少量剩下的大部分。

排放量减少的一半以上都可以由最终使用效率的改善得以解决

(百分比, 2002—2030年)



基于《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研究，
由国际能源机构经济分析部门的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 Fatih Birol 指导。



理解 投资环境

Warrick Smith 和 Mary Hallward-Driemeier

关于企业的新数据资源 提供了有助于经济体成长的见解

经济学出现的新领域之一就是从小观经济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把企业看成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器，而不是宏观经济学角度那些泛泛的综合数字。考察投资环境和企业如何生存并创造工作机会给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发展活力和减少贫困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毕竟，企业创造了90%的工作机会，为人们提高生活水平提供了大部分必需的商品和服务，还提供了大部分税收，进而为公共服务提供必要的资金。

早期对投资环境的理解——即当地一系列特定的因素给企业创造的机会和激励，以促使其进行生产性投资、创造工作机会以及企业扩张——集中于衡量国家风险的一些宽泛指标，这些指标经常以国际专家的调查为依据，通常形成对各个国家的单一评价。许多研究都局限于对外国投资者造成限制的一些狭隘问题。一些研究人员则关注国家制度和政策环境总体指标，例如法制、腐败、贸易开放度、法律渊

源和金融部门的深化。这些工作强调了财产权保障和良好治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是对总体指标和国家间回归的倚赖限制了对国家间和国内制度安排及其这些安排对不同类型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进行广泛的考察，从而也很难从影响这些行为内容和效用的更广泛的制度背景中区分特定政策行为的作用。

研究人员为了突破这些限制，几年前就开始寻找地区投资环境质量的微观层面的证据以及如何跟踪投资环境对企业投资决策和业绩的影响，毕竟高生产率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首先把世界银行的两项计划——投资环境调查和经商项目（the Doing Business Project）（见专栏1）——的观点结合起来，同时还收录了对11个国家（这11个国家最近也完成了投资环境调查）非正式部门的3000家企业的调查，以及一些国家企业开张停业过程中的人口普查纪录和注册企业数据。

投资环境数据的新资源

世界银行最近实施了两项计划,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数据链接: www.worldbank.org/wdr2005)。

投资环境调查 这项调查是从2001年开始的,现在已经覆盖了53个发展中国家的26000多家正式企业。他们收集了对企业面临的限制因素的评估,包括腐败、金融、管制、税收、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力。他们还收集了客观数量性数据,这些数据可以把投资环境指标与企业业绩联系起来,以理解其对生产率、投资和雇佣决策的影响。

例如,在印度,投资环境较差的州的企业生产率比投资环境较好的州的企业低40%。在中国,如果天津能达到上海那样的投资环境,企业生产率将提高15%,销售额将增加20%。如果能够达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最好的地区的水平,达卡(孟加拉国首都)的企业就能缩减40%的生产率差距,加尔各答的企业则能缩减80%的生产率差距;达卡的工资水平能够增加18%,加尔各答则增加38%。

经商项目 这个项目覆盖了140多个国家,主要是关于一个假想的企业经商成本和根据部分专家(律师和会计)评定的交易成本,相关信息包括与管制的不同领域(商业注册、合同实施、劳动法规)协调的时间和成本。第一份报告已于2003年出版,之后每年都会更新,增加一些主题。

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穷

经济增长的证据证明了投资环境的改善对鼓励增长和减少贫穷的基本作用——这就是中国如何使4亿人脱贫、印度如何使增长率翻番、乌干达如何以8倍于其他撒哈拉非洲国家平均速度的速度增长(见专栏2)。虽然投资环境覆盖的政策范围很广,但是新的微观层面数据源提供了有力的观点。企业从整体上通过成本、风险和竞争壁垒来评价政策和行为。其中最紧迫的问题的解决就能够得到私人部门的强烈响应。

风险 调查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与政策相关的风险是企业最为关注的。其中,政府政策的内容和实施的不确定性是第一位,接下来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乱管制、较弱的财产权保护力度。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企业缺乏进行生产性投资和创造工作的机会和激励(见专栏3)。在危地马拉大约有

90%的企业、白俄罗斯和赞比亚则有70%以上的企业认为法规的解释是不可预期的;80%以上的孟加拉国企业、70%以上的厄瓜多尔和摩尔多瓦企业对法律对财产权的保护缺乏信心。仅提高政策的可预期性一项就能使进行新投资的概率提高30%。

成本 企业承担的政策成本非常高,甚至使得许多潜在的投资机会不能盈利。经商指标表明过时或拙劣的法规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但是,法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与不可靠的电力供应和其他基础设施相关的成本、犯罪和腐败造成的成本成倍于法规所造成的成本。加上合同的实施不力和繁重的管制,这些成本占去了销售收入的25%以上——或者说是企业所纳税收的3倍还多(见图1)。在厄立特里亚、印度和肯尼亚,仅仅不可靠的电力供应造成的成本就占到了销售收入的10%以上;而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秘鲁犯罪成本超过了销售收入的10%。在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和尼加拉瓜,贿赂平均占到销售收入的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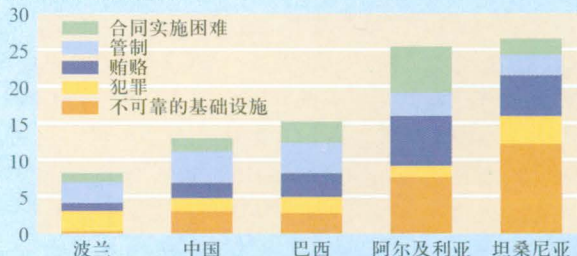
竞争壁垒 企业自然喜欢少一点竞争,但是竞争壁垒却会剥夺其他企业的机会而使某个企业受益。竞争压力可以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生产率并且与消费者和员工共同分享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实际上,《世界发展报告》发现强大的竞争压力会使创新的概率增加50%。许多因素,包括规模经济和市场规 模,都能影响市场的竞争程度。但是政府通过市场进入和退出的管制或者对反竞争行为的回应也可以影响竞争压力。贸易开放可能是最有效的增加竞争的方式之一。总体来说,竞争是很难衡量的,但是企业层面上的证据表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压力差异。90%的波兰企业声称竞争压力非常大,相当于乔治亚企业的两倍还多。

图1

阻碍成本

成本在大小和组成上存在很大差异

(成本占销售的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选择特定的国家主要用于说明成本的变动。

后推边界

当然,改善投资环境并不是削减所有的成本、风险和壁垒。税收和法规是一个健康投资环境的前提,保护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能否处理好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各级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此外,数据显示研究者和致力于改革议程的政府必须抓住另外3个不确定性。首先,不仅国家之间而且国内也存在大量不确定性(见图2),甚至同一项法律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实施也存在差异。例如,在巴西,转移一项财产的案在巴西利亚需要15天,在里约热内卢需要35天,在萨尔瓦多则需要65天。第二,投资环境条件还可能随着企业类型发生变化——通常企业越小面临的投条件越差(见图3)。第三,正如90%的企业所称的,一项法规正式的要求和实际的实施情况存在很大差异。

专栏2

中国、印度和乌干达的经验

据报告,中国过去20年的年经济增长率都在8%左右。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在1981年是64%,到2001年这一比例降至17%。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平均2.9%增长到90年代中期的6.7%,贫困人口的比例则从1980年的54%降至2000年的35%。然而,两个国家都没有一个理想的投资环境。中国最近才在宪法中承认私有财产权,不良贷款阻碍其银行部分的发展。电力部门的问题在印度则非常严重。

因此,这些国家怎样才能释放增长潜力,减少贫困呢?答案在于承诺在投资环境方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善。中国以一个基本财产权体系作为开始,该体系为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创造了新的激励。印度则开始致力于减少贸易壁垒和其他扭曲,而这些则占据了其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这些初始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投资环境条件的改善,从而清除了其他一些障碍。

一些小的国家也受益于这种改革路线。乌干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国内冲突和宏观经济不稳定之后——就开始实施了一项重大的投资环境改革,使私人投资占GDP的比例翻了一番,从1990年的6%增加到2002年的15%。从1993年到2002年,每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平均值的8倍),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从1992年的56%降至2000年的35%。

经商数据库和投资环境调查能够共同帮助政策制定者识别改革的优先次序和监督进展。前者为服从监管的正规成本提供了参考基准,后者抓住了法规在实际中如何实施以及对投资环境较差的企业所承受的成本。

处理知识议程

在确立改革的具体领域时,首先要在衡量投资环境方面取得进展。现在除了“财产权”措施,还有许多数字被报道出来,像相信法院能够保护其财产权的企业比例,使用法院维权的企业比例,执行一份合约的时间和成本,申请破产的时间和成本,报道存在违法行为的企业比例以及这些违法行为的成本,法规解释的可预见性。类似地,其他投资环境领域也能获得部分信息。由于存在国际国内的收入差异,如何释放各种规模的企业的潜力是应对发展挑战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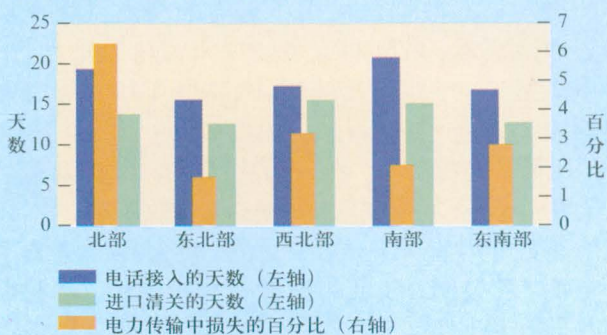
虽然早期企业层面的投资环境研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目前的调查工作还是非常巨大的。其中一部分涉及继续改善数据的收集工作,尤其是需要采取实质性的努力来改善国家统计系统。加强统计机构的工作最近几年已经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提高,包括多成员的自发性组织,例如21世纪发展统计组织(PARIS21)。这类工作可以帮助政府监督私人部门的业绩,发现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以及评估各类政策方法的影响。

国际团体制定了更加标准的投资环境指标以进行国际比较。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和经商就是属于这个方向上的贡献。除了信息分析外,他们还政府设立业绩标准和监督进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

图2

令人生厌的拖延

巴西国内的不确定性非常明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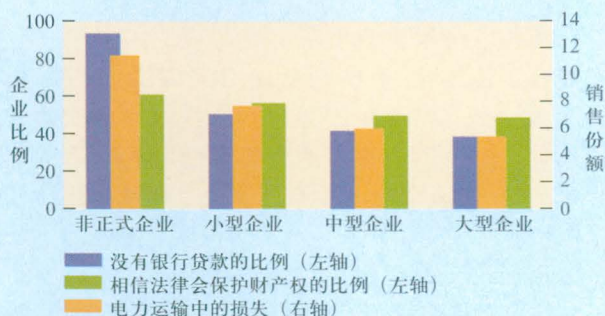
起到了改革的催化剂的作用。

随着前后连贯的数据统计系统的建立，政策制定者就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政策变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不同的政策方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更逼真地测试这种影响的能力有望获得提高。如果能够更好地评价政策的影响，就可以鼓励进行更多实验以

图3

规模非常重要

非正式企业和小型企业经常面临最严峻的投资环境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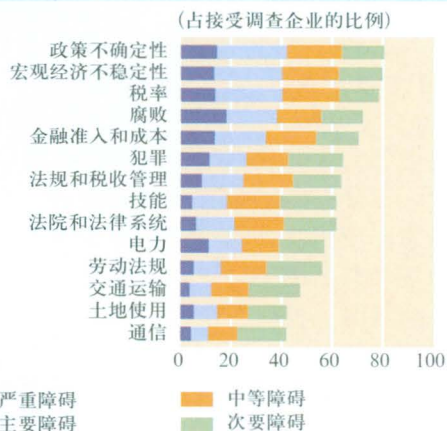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

注：选用了10个国家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的调查，假定行业、国家、所有权和企业历史不变。

专栏3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怎样评价各种投资环境限制？

早期的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覆盖了53个国家的26000多家企业。由于主要限制在国家之间甚至在国都相差非常大，调查结果表明政策风险（包括政策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不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

注：企业被要求对各个项进行评级，依据是该项是否成为企业经营和增长的障碍，分为五级，从“非障碍”到“严重障碍”。

及方法之间的竞争。对导航计划的评估可以识别出那些成功的计划从而进行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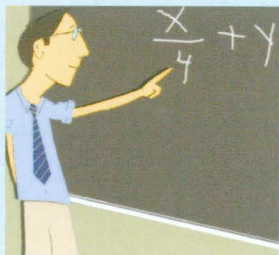
随时跟踪数据并且有可能与其他数据来源如人口数据联系起来，这样可以进一步理解企业和经济增长。企业产生与演化的模式和过程大多是以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为依据的，早期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非常相似。但是有必要加深并拓宽对这些动态过程的理解，其中包括非正式和农业经济体中企业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投资环境的作用也有必要与人员流动联系起来——不仅仅是资本。地区投资环境的质量和人员流动之间的联系使进一步研究成为必要，无论那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还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今天，从发展中国家出来的世界移民已经接近1.75亿。每年他们要给其家庭汇去900亿美元，对贫困国家和人民来讲，这已经成为第二大私人资本来源（排在外国直接投资之后）。在未来25年中，随着世界面临人口统计学的重大转变，理解投资环境条件与人员流动之间的联系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Warrick Smith，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受益》主编和 Mary Hallward-Driemeier 的副主编。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aron, and Simon Johnson, 2003, "Unbundling Institu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993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Burgess, Robin, and Tony Venables, 2003, "Towards a Microeconomics of Growth"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 Chermak, Janie M., 1992, "Political Risk Analysis: Past and Present," Resources Policy, Vol. 18 (September), pp. 167-178.
- Djankov, Sime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2002,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7 (February), pp. 1-37.
- Dollar, David, Mary Hallward-Driemeier, and Taye Mengistae, 2003, "Investment Climat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3, World Economic Outlook (Washington).
- Kaufmann, Daniel, Aart Kraay, and Massimo Mastruzzi, 2003, "Governance Matters III: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1996-2002" (Washington: World Bank).
- North, Douglas,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4a, Doing Business in 2005: Removing Obstacles for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4b,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A Better Investment Climate for Every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美元化：

Socorro Heysen

经济学也许是一门科学，不过它似乎也赶潮流。美元化——利用一种外币，通常是美元，在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易——仅仅在几年前还是各种经济学会议和研讨会的热点话题。现在，经济学家们则越来越强调谨慎，因为美元化的成本和风险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尽管如此，美元化仍然十分广泛，在一些国家甚至有了加强。最近，其他一些外币，例如欧元，也被利用起来。虽然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欧元化，不过美元化这个词经常用于指代这两种情况：美元化与欧元化。

利用美元进行实物交易与金融交易的不断增加，通常是一国公民或者政府由于本国货币不稳定而做出的一种选择。然而，尽管利用美元可以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但是同时也会使金融体系更易遭受流动性危机与偿付危机的攻击。此外，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美元化将很难撤销，即使该国一直并行维持着自己的货币并努力稳定其价值。因此，美元化应该谨慎进行。

什么是美元化？

美元化存在多种形式。全部或官方美元化是指一种外币——通常是美元——被一个国家采用，作为其主要的或者唯一的正式货币。部分或事实上的美元化是指一国在流通中保持自己的本国货币，同时也允许自由地以美元进行支付和交易。将三种不同类型的美元化区分开来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 支付美元化——美元主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
- 金融美元化——国内居民以美元持有金融资产；
- 实际美元化——本地价格与（或）工资都以美元制定。

世界上完全美元化的经济体还是较少的，其中包括厄瓜多尔、萨尔瓦多以及巴拿马。不过，事实上的或部分美元化则是广泛存在的。近年来，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以及欧洲转型期经济体的外汇存款与存款总量的比率都有所上升（见表）。

为什么一些国家要实行美元化？

美元化通常反映的是一段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历史。

一般来讲，人们都希望自己所持有的货币拥有相对稳定的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国内通货膨胀具有较高并且有不稳定历史的各国居民，比较中意于价值较为稳定的外币。

在那些宏观经济具有不稳定历史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实行了美元化，有些则没有，其中制度性因素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些国家可能通过允许使用外币，从而对由于通货膨胀而导致的储蓄下降进行牵制；其他国家则可能通过促进金融指数化计划或者采取资本控制，阻止美元化。这说明，在缺乏一个深度金融市场来支撑运用指数化工具的流动性市场的情况下，美元工具的简单、透明与可信，可能会使某些国家偏向实施部分美元化。

在实施了可信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之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色列、墨西哥、波兰以及斯洛文尼亚都成功地实现了非美元化。其中，部分国家的非美元化得到了控制，甚至是美元资产与负债直接向国内货币的强制性转化。然而，由于某些不能完全理解的原因，即使在成功地稳定国内货币之后，许多国家仍然坚持美元化或者加强美元化。在那些试图追求强制性非美元化的国家，资本外逃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1982年墨西哥资本外逃约为65亿美元），而且并不一定能够造成美元化的持久减弱，玻利维亚（1982）与秘鲁（1985）就是例证。

没有免费的午餐

尽管部分美元化在某些国家可以有助于增加的金融中介，但是同时它也使金融系统易受流动性风险与偿付风险的攻击。如果这些风险没有得到金融机构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充分评估与控制，就会通过触发银行挤兑和金融危机从而产生——甚至加剧——混乱。

当银行美元负债没有充足的财力支持时，美元化体系中的流动风险即会出现。国家或银行风险预期的增加，可能导致储户或其他债权人将其存款或信用转化成美元现金，或将其转移至国外。美元负债必须以同等的外币支付。除非他们在国外拥有充足的美元流动资产作支持，银行可能因此耗尽流动美元储备，并

控制风险才是关键

美元化的增长

尽管存在着许多风险，美元化仍然在扩展。

(外币存款占银行存款总额的百分比)

地 区	国家 数量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南美洲	9	45.8	41.6	44.6	48.1	49.2	50.9
转型经济体	26	37.3	38.9	43.5	44.3	46.9	47.7
中东	7	36.5	37.2	37.7	37.5	38.2	41.9
非洲	14	27.9	27.3	27.8	28.9	32.7	33.2
亚洲	13	24.9	28.0	26.8	28.8	28.7	28.2
中美洲	6	23.2	23.4	24.7	24.8	25.2	27.3
加勒比地区	10	6.3	7.6	6.8	6.7	6.1	6.2
发达国家	14	7.4	7.5	7.5	6.7	7.0	6.6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数据共享系统《国际金融统计》，以及各大中央银行的统计出版物。

在此过程中耗尽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就像墨西哥在1982年，阿根廷与乌拉圭在2001年，玻利维亚在2003年的情况一样，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可能触发美元债务的挤兑。

部分美元化金融体系中的主要偿付风险则是由于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所造成的，而本地货币的巨幅贬值将对其净值产生影响。当外币资产与外币负债存在差异时，即形成货币错配。当一家银行的外币负债高于其外币资产时，本地货币的贬值将减少其净价值，从而损害其偿付能力。譬如，当一家银行以外币存储，同时以本国货币进行贷款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一般将之称为外汇风险。当一家银行给货币错配的企业或家庭贷款时，即使该银行本身并没有货币错配，但是由于本国货币贬值的间接作用将导致该银行蒙受损失。贬值会使未采取对冲措施的借贷者蒙受损失，从而影响到对银行的还贷能力，并有可能导致拖欠。当银行系统贷款投资组合大部分集中在这种类型的借贷者身上时，该银行将面临源于其借贷者外汇风险而带来的货币引发的信用风险。这些损失可能会威胁到银行的偿付能力。

如何控制风险？

在美元化的经济体中，某些政策制定者正在寻求减少其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弥补政策：致力于控制美元化

的流动风险与偿付风险的审慎政策，使本国货币更具吸引力的措施以及减少美元化。

致力于限制流动风险的政策在高度美元化的经济体中很普遍，但其程度与性质都有所不同。国外大量的现金外币流动资产和大量的外币储备资产经常充当一种缓冲器。当发生银行挤兑时，它可以降低流动资产耗尽的可能性，同时还能减少银行挤兑发生的可能性。在某些国家，这些流动资产的大部分是与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相适应的。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保持在国外储备大量的流动资产

产，或者是自愿的，或者是由于管制上的流动性与储备要求。这些管制的目的就是确保银行对高流动性资产的持有成本进行分担，从而使美元化环境下的操作风险内在化。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具有明确的安排，允许中央银行提供外币的流动资产援助。如果中央银行持有大量的国际储备，这些安排的可信度将会得到提升。

控制货币引起的信用风险的政策，虽然仍然很少，但越来越普遍。其主要目标是鼓励金融体系中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将美元化环境中的操作成本内在化。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大量的可行应对措施。其中这些措施在向未进行套期保值的借贷者（阿根廷、智利、黎巴嫩）借用外币的禁止或限制存在很大差异；也有对未进行套期保值贷款的更高的规定或资本要求（格鲁吉亚）。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信用风险管理规则，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对潜在的与实际的借贷者的货币引致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秘鲁）。

提高本国货币吸引力的政策，主要着眼于降低其货币使用的风险与成本。这些措施包括，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消除对利率上限的行政限制、降低对本国货币储蓄的大额无报酬储备的需求、朝向通货膨胀目标制与更具有弹性的汇率体制发展、为本国货币中占统治地位的公共安全开发市场、改善本地支付体系的效率。

Socorro Heyse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系统部技术支持顾问。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改革 正当时

Vijay L. Kelkar、Praveen K. Chaudhry
和 Marta Vanduzer-snow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应该如何 改革，以应对 影响全球经济 的新力量。

各种能够生存下来的国际机构反映出了特定时期的历史需要，而各机构的强势在于其适应和为变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服务的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者基金组织）很好地为构成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动态经济力量提供了服务（见2004年9月《金融与发展》中的《IMF60周年》一文），但现在，随着一系列新力量的出现，IMF已经到了根据当前需要而不是上个世纪的地缘优先政治原则进行自身调整的时候了。本文设定了一个改革的日程，提议对IMF的功能和管制同时进行改善。改革后的IMF将鼓励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安全，并推动全球化，从而使所有人受益，而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地区或特定的国家受益。

新的全球政治经济

对全球政治经济的管制给各种机构提出了要求，他们需要具备反映世界体系中经济力量动态分配的能力。IMF要进行有效的运作，就必须进行调整，从而能够应对七种主要经济力量的挑战，这七种力量极复杂地发生作用，改变着

全球经济格局与权力中心。

- 新技术。由日益增长的知识经济与激烈的竞争所驱动的新技术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同时加强经济全球化与互动。

- 私人资本流动。这些流动正主导着全球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当资金被突然提取时，有时会加大经济危机。

- 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正在老龄化，而发展中经济体则拥有较高比例的工作年龄人口。这种变化将导致更多的资金流入拥有年轻人口的国家，促进发展中国家增长率的提升。

- 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它们在全球产量与贸易中的份额有了极大的增长，在21世纪的上半叶还可能继续增长。

- 全球经济中亚洲的崛起。就GDP来讲（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世界上最大的四个国家中的三个——中国、印度与日本——都在亚洲。

- 不断增长的区域主义。由于IMF自身重组的速度很慢，一个主张区域货币安排的新讨论出现了。

- 政府、企业与国际机构具有更大

的透明度与责任感。政策制定者、政治家以及其他社会精英之间的国际认同不断增强。这种认同强调民主、人权、透明度以及选民责任感的至关重要性。对 IMF 来说,这意味着在其主办的项目中,需要更多的议会监督以及更大的开放性。

基于 21 世纪不断变换的环境,我们建议在保留创立者精神的同时,IMF 应该在下面的领域中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资本基础

应对全球化新浪潮的第一要务就是加强 IMF 的资源基础。与全球 GDP、全球贸易水平、国际资本流量或其他任何可比的全球层次的流动性指标相比,IMF 当前可以使用的资本实在太少了。

全球资本市场由相对少数的大国主导,在危机发生时,羊群效应将使他们的行为严重破坏一国经济或区域经济的稳定。IMF 可以充当必要的平衡力量,需要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这样有关的经济体或区域才能回到原来的发展轨道上。如果要这么做,IMF 的资源基础必须增强。不能对此做出反应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可能损失要比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基金组织的机会成本高得多。

没有精确的公式可以用来确定基金组织的最优规模,但如果规模太小将会产生附带风险。与其他任何相关的参数相比,其规模(以 IMF 的特别提款权(SDRs)来衡量)有了极大的缩减。自从 1998 年以来,在配额上就没有总体的增长了。传统上,配额总水平是根据配额计算公式中的主要经济指标来评估的。考虑到弹性汇率越来越盛行(尤其是与布雷顿森林之后的一段时期相比)以及私人资本市场的增长,相对来说,IMF 没有必要像刚成立时那么大。然而,尽管 IMF 的资本基础从 1978 年的 611 亿 SDR(第 7 次配额测评),增长到 1998 年的 2120 亿 SDR(第 11 次测评),但自从 1978 年以来,与大量的全球指标相比,IMF 的规模有了急剧的缩小。全球经常账户交易的配额总量从 8.5% 下降到 1.8%,GDP 的配额总量从 1.4% 下降到 0.8%,外汇储备的配额总量从 33% 下降到 9%,而世界进口的配额总量从 9% 下降到 4%。

除增加配额之外,IMF 还可以通过从资本市场借贷以及创造短期自流动 SDRs,以满足流动性的需求,从而增强其解决危机的能力。此外,还应对其准入政策进行修订,加强对双边与多边经济的监督。向 IMF 贷款,譬如紧急纾困融资(stand-by arrangement)或补充储备贷款,应该根据成员国的金融需求而不是由其当前的配额大小来决定。虽然 2002 年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的《人类发展报告》直接承认,富裕国家总能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的决定,然而 IMF 规模的增加,将为较小经济体创造空间,增加其参与度。

选举权

需要改革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国家代表与选举权。IMF 基本上受到配额体制的支配,执行董事会上一个国家的选举权也是由其配额决定的。IMF 的每个成员国都有 250 个“基本选票”,此外,每 10 万 SDR 配额可以增加一个选票。基本选票用于保护较小国家的利益,然而配额整体的连续增长减少了基本选票的份额,从 1945 年的 11.3% 减少到 2%。我们建议进行一项调整,从而能使基本选票回归到 1945 年的水平,并通过一系列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88.7%)以及基本选票(11.3%)的加权平均值重新分配选举权。以这种方式计算的结果,不需要取消美国的否决权,就可以适当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权重。先进经济体的选票份额将从 62% 下降到 51%;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将能有更大的发言权。除沙特阿拉伯等债权国之外,中东国

**“为了更好地管理全球经济,IMF 的
股东应该对理事会进行完全授权,
让其真正地独立。”**

家的选票份额将保持原样。较小的欧洲国家的选票份额将急剧下降,但欧盟(EU)将保留否决权。由于创造出了远多于“输家”的“赢家”,建议的配额体制改革有了现实的安全通过的机会。

选举权的重新分配,将不仅矫正当前 IMF 内部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还将增强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在我们看来,由不同的国家联合决定的否决权将促进合作。欧盟国家与日本、中国、印度的联合体应该分别拥有否决权。同样地,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应该享有一票否决权。由于不断增强的全球相互依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这种授权不会走入僵局。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这种指定的配额改革将增强机构中的合法性与参与度,促进有关全球经济管理的对话。

这些改革将有效地解决针对 IMF 的一个主要批评,即“民主不足”。随着 IMF 不断制定标准并协调规则,

从而加强成员国的银行业和金融部门,如果IMF希望保持相关的话,不同国家的参与能力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相互认同的规则被授予了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是一种减少名义上的违反或顺从的重要方式。在IMF内部增强民主实践,能增加小型国家的投入以及不同的观点,从而有助于危机的预防和管理。

重组执行董事会

当前,在IMF的执行董事会中,欧洲占有10个席位,而亚洲只有5个,非洲则仅有2个。西半球拥有5个席位,而澳大利亚只有1个。欧洲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为29%,亚洲则为32%。考虑到当前增长率的趋势,亚洲与欧洲的这种差异只会朝有利于亚洲的方向发展。因此,毫无疑问,如果基金组织要反映当前的现实,其管理结构(主要是选举与理事会上席位的数量)需要进行重新调整。

要改善管理,仅仅改变配额的份额或重新分配席位是不够的。为了更好地管理全球经济,IMF的股东应该对理事会进行完全授权,让其真正的独立。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经济,同样也需要独立的中央银行。

解决方法之一为,执行董事会的每个成员都由成员国的议会或其他代表机构选举出来。任何人都不能被推荐到董事会,即使他或她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选民。执行董事会成员的任期应该是固定的;其任期可以是6年,不过董事会的1/3应该每两年进行选举,从而保持连续性。为了确保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应该有任职一期的限制。这些改革将使董事会真正地独立,而IMF将能吸引优秀的专家来到董事会;这将增强客观的双边与多边监督,并改善危机的管理。

执行董事会还需要更具责任感。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建立一系列由股东们达成一致的基准点或理解备忘录,从而衡量董事会的绩效。提高IMF责任感的另外一个方式是,积极地参加包括那些债权国的成员国议会。毕竟,IMF的责任感是相对于其股东来说的,而这些股东代表着各自的议会(如果有议会的话)。参与议会的附加利益将是改善的政策与一致性,尤其是那些大的经济体。换言之,经济监督将更为有效。IMF的前任总裁霍斯特·科勒(Horst Kohler),已经开始做主要股东选定机构的简报了。

经济安全理事会

由于IMF不能代表所有184个委托成员国的利益,一些区域已经考虑自己行动了。就亚洲来说,这并不是

一个空头的威胁。亚洲的中央银行已经积累了两万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谈论。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的55%左右,一些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体都位于亚洲。虽然亚洲货币基金的建立似乎是合法的,但这样的基金组织将有可能导致区域金融机构的增长,最终阻碍全球经济的发展。多样的金融机构的扩展,将给国际体系中有效的危机管理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

为了避免区域金融机构的增长,IMF应该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安全理事会”,并作为最后求助的全球贷款方。IMF的主要角色应为应对当前强烈的全球化浪潮,促进全球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所有国家提供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理事会通过各国的风险分担,使得更好的风险管理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延伸。研究表明,基于市场的现代经济要有好的表现,政府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宏观和微观上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将其作为公共政策框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个时代,国际组织必须帮助减轻并分担风险。毕竟,美国的梅尔策委员会已经提议进行影响深远的改革,建议IMF应集中于短期流动性危机援助,并废除对结构改革的长期贷款。

结论

IMF为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动态经济力量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它现在需要经历制度性改革,从而让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能够反映出新的潜在力量。由于将决定权交到了少数富裕国家的手中,国际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在确保那些被剥夺了权力的人或国家所关注的内容得到反映方面做得很少。IMF要实现新生,并给发展中世界一个更好的说法,还有一段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现在可能正是接受英国财政部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提议的时候了,他呼吁召开一次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采取必要的措施改革全球金融结构,创造出一个适合21世纪的IMF。

霍斯特·科勒(Horst Kohler),IMF前任总裁,同时也是2002—2004年印度财政部的顾问。Praveen K. Chaudhry,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University)的政治学助理教授。Marta Vanduzer-Snow,纽约大学政治系的研究学者。

参考文献:

Kelkar, Vijay L., Vikash Yaddav, Praveen K. Chaudhry, 2004, "Reforming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World Economy*, Vol. 27 (May), pp. 727-43.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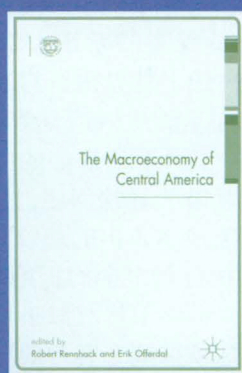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帕尔格拉夫·麦克米兰出版社的最新著作



新兴市场的规则性 (rules-based) 财政政策: 背景、分析与展望

近期, 由于受一些先进经济体经验的启发以及为了加强信誉, 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采取了一些限制政府赤字、支出或者债务的规则。《新兴市场的规则性财政政策》一书包括 15 章——都是由著名政策分析家和著名学术界人士撰写——主要关注财政规则对于这些经济体的潜在有效性, 重点论述实施这些规则的主要经验。

2004 年 9 月	304 页	216 × 138mm
精装	55.00 欧元 / 75.00 美元	1-4039-2085-0



中美洲的宏观经济学

随着中美洲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逐渐加强, 该地区经济增长和投资的机会在未来几年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然而, 这种一体化也给确保经济增长能够持续并且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经济政策带来了重大挑战。《中美洲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强调将保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性, 加强在基础设施、基础卫生防疫、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方面的投资, 以及应对部分美元化带来的风险。

2004 年 8 月	240 页	216 × 138mm
精装	50.00 欧元 / 69.95 美元	1-4039-3652-8

《金融与发展》提供一下服务:

凡采用下述促销号码订购上述著作, 可享受 20% 的折扣

美国

促销号码: **P356ED**

在线订购: www.palgrave-usa.com

电话: (888) 3308477

传真: (800) 6722054

世界其他地区

促销号码: **AFIN&DEV05A**

在线订购: www.palgrav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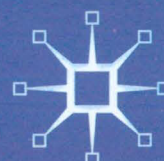
电话: +44 (0) 1256302866

传真: +44 (0) 1256330688

2005 年即将出版的新书

《印度和中国近期改革的经验与经济增长》

David G. Cowen 和 Wanda S. Tseng 编



沃尔芬森之后：对世界银行的评估

赛巴斯蒂安·马拉贝关于世界银行及其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的这部著作，不仅吸引了众多的读者，而且还引发了对世界银行及其使命的真切讨论。因沃尔芬森的第二个任期将于6月份结束，一名新任命的行长即将取代他的位置，所以本书的面世恰逢其时。

为此，《金融与发展》杂志邀请了下面两位对世

界银行运作有独到见解的人物来评述《世界的银行家》一书：Nancy Birdsall——全球发展中心主席，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捐助基金任职，并担任泛美开发银行执行副总裁。此前，她曾是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主任。Moises Naim——《外国政策》杂志主编，曾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和委内瑞拉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他是沃尔芬森1996年的4名高级顾问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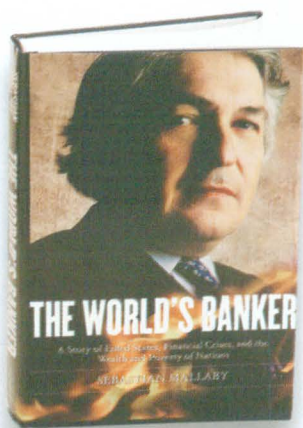
必不可少的银行

Nancy Birdsall

有关公共政策的书籍，也许就像许多大官僚机构的发展专家的强制工作，很少让人感到兴趣。他们的观点和他們所面临的政策两难状况不可能在周末晚会上被表述得很透彻。而马拉贝却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而且做得很漂亮。他似乎是在撰写一部关于一个高大人物——过去9年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詹姆斯·沃尔芬森的著作——而使发展政策具有了活力。但是，他书中关于沃尔芬森的内容（这正是本书的可读之处）其实并非问题的实质。世界银行本身也不是问题的实质。这本书描写的是上世纪90年代变化中的全球经济发展情况。对于越来越多地受到巨大贫富差距困扰的人们来讲，本书剖析了发展共同体（世界银行是其惟一的中心机构）所面临的复杂情况、遇到的限制和偶尔的胜出。了解世界银行、对发展问题知情的人士将从中获得新的独到见解，非专业人士（和世界银行下一任行长）将会从中受到启发，能够以一种均衡的视角来看待世界银行的问题与潜能。

马拉贝从该发展共同体及其主要领导机构正面临的信心危机这一问题出发，认为专家们对富国如何才能帮助穷国的旧诀窍已失去了信

Camilla Andersen，图书编辑。



赛巴斯蒂安·马拉贝 (Sebastian Mallaby)

世界的银行家

有关政府倒台、金融危机和国富与国贫的故事

企鵝出版社，纽约，2004年
462页，29.95美元（精装）

心。毕竟，上世纪90年代尽管中国和印度忽视了世界银行政策信息，对世界银行资源的接受大于寻求，但是其减贫进展是最大的。在世界银行和其他捐赠者资助了某些政府50%预算的非洲，90年代的“发展”却几乎以失败告终。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世界银行计划（例如，筹措资本投资、关注乡村贫困、坚持要求曾经作为中央集权的经济体进行市场改革）在最贫困的国家没有起到作用。但新的解决方案（例如，构建可持续的制度和消灭腐败）则是令人困惑的，对巨额投资的冷淡反应令人感到压抑。最令人沮丧的

是，建立制度这种事是具有当地特色的，能否取得成功似乎取决于其伟大的男性和女性（就像马拉贝描述的关于乌干达中央银行行长及其前任财政部长秘书 Emmanuel Tumusiime-Mutebile的动人故事那样）。

马拉贝以世界银行成败的例子阐明从外部“搞”发展的难处。他对世界银行在下列事务方面的种种失策有着现实的想法。对于艾滋病，他概述了世界银行对这一问题的迟到而毫无生气的觉醒；在玻利维亚，一名具有进取心的经理提出的取消耗时的贷款程序、并减轻玻利维亚人成本负担的建议，遭到世界银行执行董事会的拒绝；在印度尼西亚，世界银行对似乎是取得减少贫困成就的某个客户的腐败行为视而不见。对于这些和其他缺点，他没有像人们通常会做出的那样，气势汹汹地指责那些为获得晋升而推动贷款、薪水特高而又受宠的世界银行职员。事实上，他刻画了世界银行许多无名英雄（那些敢于冒险并挑战旧制度的经理们以及那些工作最辛勤、最忠诚、最希望也能够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职员）的美好形象。

对于应承担的责任，马拉贝也直言不讳。对于强加给贷款国（这些国家的穷人本可以从电力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中受益）的不合理的环境标准，他将责任归咎于富国的非政府组织（NGOs，用他恰当而丰富的语言来形容就是：他们“只知

拉闸，而不管合闸”)。对于强迫世界银行放弃在中国的某个项目(该项目本可以帮助中国居住者藏族少数民族的乡村省份的穷人)的做法，他将责任归咎于美国及其国会。说他们只是一味地迎合那些不负责任的NGOs(并且还批评沃尔芬森长时间地自信他能够劝说他们静下心来做的做法)。对于世界银行错失了在伊拉克发挥其重建专长的机会，他将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对于坚持要求世界银行处理每一个新的全球问题、然后又抱怨其不分轻重缓急，他将责任归咎于其最有影响力而又一意孤行的成员国——美国和其他7国集团成员国。

书中也不乏对世界银行成功经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乌干达的超常发展就得益于这些勇敢的世界银行英雄之一，他(她)巧妙地避开了世界银行的传统习惯，去帮助 Tumusiime-Mutebile 部长。在波斯尼亚，善于随机应变的世界银行职员冒着枪林弹雨工作，并且破天荒地解决了战后关键重建项目融资困难的问题。世界银行的研究部是该发展共同体公认的“智囊团”，世界银行所做的分析是其惟一最杰出的贡献。马拉贝在分析世界银行的成败时，一直以坦诚叙事来代替醒目大标题的使用，从而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不过，马拉贝所说的一切也不尽其然。如果没有NGOs，则世界银行还会像几十年前那样，用烦琐的程序和拖延来困扰借款国，直到环境和其他预防措施出台后才解决这一问题。马拉贝担心沃尔芬森关于宗教与文化的倡议。但实际上，要求世界银行对有意义、有作用的各种发展战略问题都能有某种能力精通也是不合情理的。对世界银行缺乏“重点关注对象”的抱怨可能是合理的，但这些抱怨应当以世界银行的贷款和职员工作时间的分配，和不情愿接受以其在某一国的

项目运作为交易条件的做法为依据，而不应当以行长看得见的(和低成本)的倡议为依据。广义地讲，世界银行的影响远没有马拉贝有时似乎假设的那么大。世界银行职员并没有去“驾驭借款国政府有关艾滋病、行政部门改革及其他难题的战略部署”。马拉贝强调世界银行不断面临的来自NGOs的压力会使其使命带来风险，这些风险正在逐渐降低借款国对世界银行服务与贷款的需求。但事实上更大的风险可能来自那些对世界银行究竟是否能起作用(特别在可以部分地使用私人资本的中等收入国家)提出质疑的人们。

不过，这只是给一本好书提出的一小点意见。马拉贝在他的书中得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为了打赢我们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战役，即克服贫困，这个世界离不开世界银行。



令人羡慕的自主权

Moisés Naím

有关世界银行的书籍，往往不是关于经济发展的不切实际的专题讨论和对具体问题计量经济学分析，就是毫无成效的夸夸其谈。《世界的银行家》一书就打破了这样的倾向，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赛巴斯蒂安·马拉贝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不充分这一主要难题以及负责扶贫工作的多边机构面临的实际问题。

虽说《世界的银行家》一书一定会影响未来历史学家评判詹姆斯·沃尔芬森业绩的方式，但这还不是本书一定会成为任何对世界银行感兴趣的人所必备的参考书的主要原因。它持久的贡献在于它阐明了这个必不可少的机构的性质及其

所为，而非其某一任行长的品行。马拉贝巧妙地引证了沃尔芬森既要改变这个机构又要开展扶贫工作的尝试，目的是为了说明这样一项事业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马拉贝被允许查阅大量珍贵文件，并且他似乎也看完了这些文件，而且挤时间采访了世界银行内外200名人士，包括沃尔芬森本人。马拉贝对波斯尼亚、乍得和乌干达的出行，为书中某些最吸引人的章节提供了第一手的支持信息。但马拉贝不只是一个文章写得好、工作辛勤、深谙与消息灵通人士沟通之道

“世界银行行长的
权力是巨大的，他
享有令人惊讶的
自主权。”

的新闻记者，他还知晓关于经济发展的专业文献并且显然对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有充分的理解。本书充满了丰富多彩的趣闻轶事，成为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台阶。例如，马拉贝引述了乌干达独揽经济大权的人物 Emmanuel Tumusiime-Mutebile 的故事，目的是为了总结有关非洲政府与外援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更概括地讲，是有关发展和管理经济变革的有趣经验。

马拉贝对几位世界银行职员及其常有的英雄事迹的介绍，足可以批驳人们普遍的看法，即世界银行职员是一群被娇惯坏了的和懒散的官僚。虽然世界银行不乏官僚式懒散作风的黑洞，但也有不少工作辛勤、有理想的专业人士，他们往往是他们那一领域的佼佼者。而且，马拉贝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在世界银行的最高层和具有影响力的外部参与者(例如，NGOs和捐赠国)中，比其基层更容易找出缺乏效率的原因。

《世界的银行家》一书还经常有

意无意地提及围绕着重新设计全球金融架构必要性这一问题所发生的争议。本书虽没有直接涉及这些问题，但却强烈地指责了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建议。那些建议忽视了构成全球金融架构核心的各个机构实际运作的现实。马拉贝通过说明世界银行如何做出重要决策，来揭露那些建议的短视之处，即没有涉及任何一个新的多边机构将如何克服目前束缚世界银行的问题。批评家也需要说明世界银行最终将如何解决全球重要问题，正如本书所揭示的，世界银行反而常常是一个采取积极的不同举措的惟一参与者。

本书一个令人难解的缺点之一，是它忽视了对自己最明显的发现之一的讨论：世界银行行长的权力无边，他享有令人惊讶的自主权。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世界银行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一个巨大的治理结构上，为得是使其高层经理负起责任，并预防其过分为行。既然行长受到许多外部选区的限制，那么，马拉贝所指无边的自主权甚至就更令人惊讶了。沃尔芬森必须与一个由24名全职的和名义上独立的执行董事组成的委员会据理力争，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一个替补董事和几名专家及助手的支持（他们每年发生的直接成本是0.56亿美元）。世界银行还必须解决下列机构的需要：一个行长委员会、一个检查组、一个评估办公室、各捐赠国的公共机构及其国会、很多激进的NGOs、一个全球性的新闻监督媒体和一个由10,000名成员组成的强大的内部机构。

然而，《世界的银行家》仍然表明：尽管出现过那么多强烈的戏剧性场面、不知每一个相关人员发过多少脾气、有过多少冲突和失望，但沃尔芬森还是能够让他几乎所有的倡议（有最基本的，也有异想天开的）得以实施。要求批准在已有的11亿美元管理成本支出的基础上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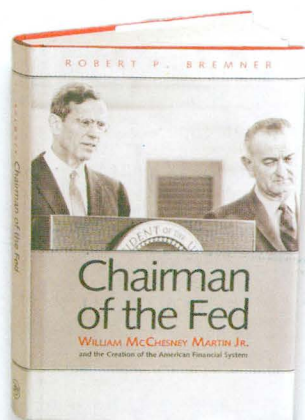
增加2.5亿美元吗？是的。强迫采纳他非常独特的“综合性发展框架”作为指导世界银行及其借款国战略的准则吗？是的。加大对世界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和整个组织结构的改革力度吗？是的。花费几百万美元派遣世界银行职员到美国各商学院去短期培训吗？是的。把世界银行的使命称为“一个梦想”吗？是的。所有这些想法都不见得不好，但其中至少有许多是相互矛盾的。

为了使这些倡议得以实施，沃尔芬森手上也许有一份很长的清单，上面写着他必须做出让步的各种方案。还有一份同样长的清单上是他不能实施的、也不愿意说出的想法以及上面写着对他做出的各种决定的一份清单。但本书仍要说明的是，他享有的自主权，是民主社会公共部门的最高层官员们、甚至也许是大型上市公司的部分首席执行官官员们所羡慕的。

沃尔芬森在10年当中用这样的权力成就了什么？据马拉贝说，不是很理想，甚至没有完全达到沃尔芬森想要达到的目标。沃尔芬森有三个主要目标：改善世界银行内部管理、改进世界银行向他国提出的建议以及改善世界银行与关键利益相关者（股东、NGOs和借款国）之间的关系，马拉贝以这些目标作为评价他担任行长的业绩标准。马拉贝得出的结论是：管理目标是沃尔芬森得分最低的一个目标。尽管他称赞他在追求其他两个目标时的一些改革措施，但同时也提出许多警告并持保留意见。

对管理业绩的评价总是主观性的。而对于世界银行这样一个机构，由于它的影响是长期而十分难以估量的，所以，这项工作就更不容易做。今天，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卸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20多年后，对他的业绩仍存有争议。毫无疑问，对沃尔芬森任期内的业绩也同样会有争议。

赢得独立



Robert P. Bremner

《美联储主席》

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美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创建

耶鲁大学出版社，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2004年，368页，38美元（精装）

“马丁时代实施的改革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纽约证券交易所从未经历过如此广泛传播的重复自交易，这种情形将比尔·马丁推到了交易所总裁的位子上”。Robert Bremner用这样的语言概括了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在1941年初离开纽约证券交易所时所做出的贡献，因为他是在34岁时应征入伍的。这本传记描写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整个职业生涯，他似乎总是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做出了正确的决策，并为其国家和整个世界做出巨大贡献。

比尔·马丁在迪克斯堡的时间并不久。很快就受命负责俄罗斯的借款—租赁计划。二战以后，他成为进出口银行行长，后又调往美国财政部担任国际事务助理秘书。此间，他于1951年初期参与了财政部与联邦储备银行的“协议”谈判工作，根据这一协议，美国中央银行

恢复了其在货币政策上的形式上的独立性，与其在法律上的独立性相符。联邦储备银行不再对盯住长期（或短期）国库券利率承担全部义务。马丁一个月内即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至1970年1月31日。

接下来的工作并不轻松。马丁任上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必须实施那份“协议”，并且逐渐赢得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同时，马丁和其同事必须处理1954—1955年朝鲜战争后发生的、1956—1957年复发的通货膨胀问题。由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两次经济萧条，理查德·尼克松实施的联邦储备银行高利率导致其于1960年败给约翰·肯尼迪。

在林登·约翰逊接任肯尼迪之后，越战逐步升级，通货膨胀压力又卷土重来。马丁希望通过财政政策来限制通货膨胀，但遭到总统拒绝。当他最终勉强同意提出征收一项附加税建议时，美众议院赋税委员会（Wilbur Mills）主席却不予考虑。他说，除非总统也提出削减支出的计划。总统既要花钱买枪（打仗）又要买黄油（他的反贫困计划）。在这一问题解决以后，通货膨胀（急剧恶化，一直到80年代初期Volcker

主持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严厉措施之后才见好转）出现了。马丁任上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有些过于迟缓，Arthur F. Burns和G. William Miller主持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情况依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美元和黄金储备开始面临压力，1967年英镑贬值，1968年建立双重黄金市场，直到1971年尼克松关闭了美国官方黄金交易窗口为止。

Bremner对马丁一生的描述既迷人又使人增长见识。即使那些主要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经济学家对其中几处描述可能难以理解，因为他的分析是不完整或多少有些令人误解的（可是马丁自己算不上是经济学家，他也不相信经济预测）。例如，Bremner没有说明人人都关注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是贸易逆差或经常账户逆差——事实上美国的这些项目都是顺差——，而是由于官方短期的对外黄金储备求偿权的增加而造成的。

Bremner出色地表达了马丁所面临的挑战及他的经营理念：尝试解决问题并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在政府内部的保持其独立性。马丁协调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努力（结果导致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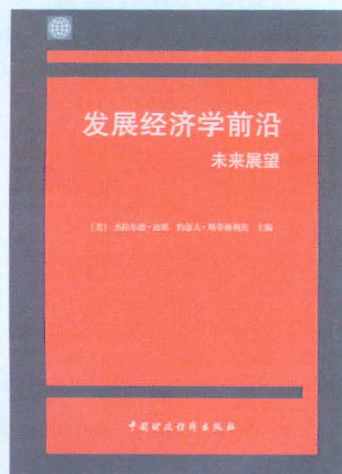
货大膨胀）曾经受到Allan Meltzer的批评。“要求协调政策的政治压力强化了人们的这一普遍看法，即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必要的”，——2004年10月Meltzer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一份报告中说。人们可以不同意Meltzer的观点（我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尝试后失败了，但却总比不去尝试要好——，并且仍然可以指责马丁、他的同事和他们继任者的货币政策。Bremner

“考虑很多问题——特别是关于美国的财政政策在其目前危险的轨道上继续执行的后果。”

这本优秀传记的读者可以有自己的主见。他已经成功地让他们去考虑很多问题——特别是关于美国的财政政策在其目前危险的轨道上继续执行的后果。

Edwin M. Truman
国际经济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世界银行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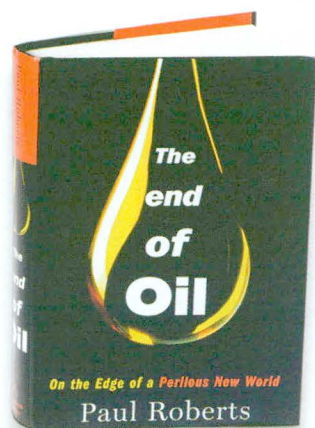


当今著名经济学家杰拉尔德·迈耶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的中文版近期已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本书集中了世界30多名著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做了前瞻性探究，同时对发展经济学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尤其针对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来减少贫困方面，进行了及时评判。该书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学”在将来是否仅仅被视为一门应用经济学，或者就发展经济学的性质和研究范围而言，是否需要专门的发展理论来补充一般的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前沿——未来展望》在总结过去两代发展经济学家杰出代表对发展思想评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下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书号: ISBN7-5005-7083-X/F.6199 定价: 60.00 元

订购电话: 010-88190414 88190406 联系人: 蒋鹏飞

为石油枯竭作准备



Paul Roberts

石油枯竭

处于危险新世界的边缘

纽约霍顿·弥福林出版社，2004年，
400 页，26.00 美元（精装）

这是一部关于世界对石油的痴迷、石油的最终耗尽以及积极主动寻找替代能源的适时的、可读性强的书。同时又是一部关于政治，特别是石油与美国的中东政策相互影响的书。本书指出，美国过分的石油消费、石油储备集中于中东以及油价的不稳定，共同造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局面。而且，即使根据乐观的计算，石油产量也将于30年内的某个时间达到极限，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即使石油不会枯竭，但继续以现有的速度消费石油也是愚蠢的，因为它对环境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Roberts 认为，尽管石油是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它也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原因。他将石油市场的发展与海湾战争、2001年的9·11事件相联系，并且明确地批评美国本届政府的能

源政策。他指出入侵伊拉克不仅是为了控制石油，而且也是为了永久打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控制石油供应的权力。按照Roberts的说法，这种对石油供应安全的着魔，甚至于不惜借助军事手段（而不是花更大精力去节能并寻找替代资源）的做法，反映了美国消费者（作为地球上“最没有能源意识的人”）的态度以及美国石油与汽车业的利益。

“美国过于关注
保障中东的石油
流量，而没有
积极地开发
替代资源。”

这部书对OPEC也毫不客气。书中指责OPEC控制油价的无效（以及往往是有害的）努力，这和中东政治的不稳定一并成为油价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Roberts还很严厉地批评了OPEC成员国对其石油收入的管理方式。

Roberts指出，政策制定者缺乏恰当的激励机制让世界为石油枯竭做好准备。一方面，美国过于关注于保障中东的石油流量，而没有积极地开发替代资源。另一方面，过去在寻找替代能源的过程中曾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目前尚未做好让石油退出市场的准备，因为石油既不短缺、也不昂贵。过分使用石油的真正代价是对环境的损害及其产生的后果。

因此，本书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改变人们的态度和政策的主要推动力是由过度使用碳氢化合物所造成的不利气候变化。石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实施可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为此，Roberts提出了放射性碳排放、资金充裕的研发努力和竭尽全力降低美国石油消费的总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他写道：“现在开始这样做，还可以大幅度提高我们成功的机会，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在如何处理能源问题上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自由度。”

本书中许多有用的信息与分析，都是根据大量研究及与专家的讨论得来的。但是，尽管书中有关政治、趣闻轶事性的证据和详细史实的内容很丰富，但其分析有时却过于新闻化（例如，与氢燃料电池技术相关的问题）或者以有限的证据（例如，引述未经署名的官员和专家的话）为根据。而且，尽管书中对人为干预转移对石油关注的需要是有理由的，但是，作者没有对经济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油价的上涨，和其他自动机制进行充分的考察。有的人可能认为其中的政治分析多少有些简单。特别是，书中过多地强调了石油政治中的冲突。它假设OPEC一直并将永远是存有敌意的。它没有看到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进行更好的协作（以便让不可避免的石油流动变得更顺畅）的任何机会。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给人印象深刻的书。尽管它的分析和结论是有争议的，但却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做出严肃认真的考虑。

Hossein Samie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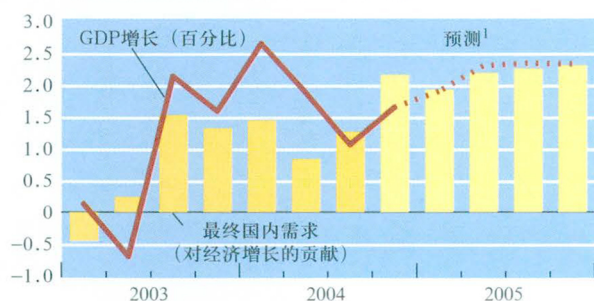
IMF 研究部

商品单元组组长

欧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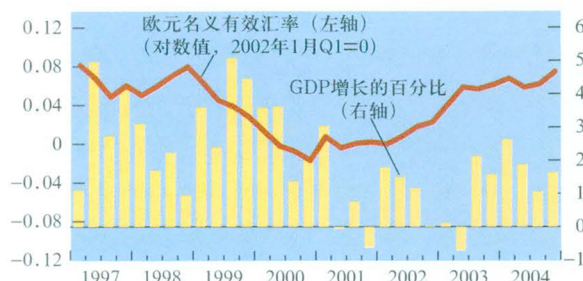
尽管 2005 年经济增长略有加速，但是必须改善生产率和劳动力参与状况，以缓解老龄化的财政压力，其中包括不断上升的养老金债务。

较高的石油价格削弱了经济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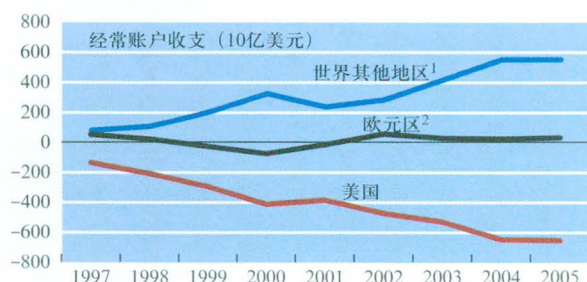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和IMF员工的预测。
¹IMF员工预测从2005年1月份起。

欧元尽管走强，但是其波动似乎对经济活动没有太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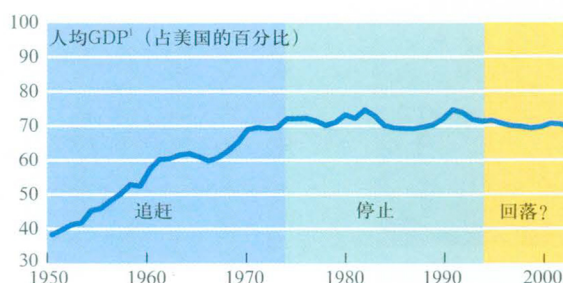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和IMF员工的计算。

尽管汇率存在巨大波动，但是欧元区的经常账户依然接近平衡——与美国的状况形成了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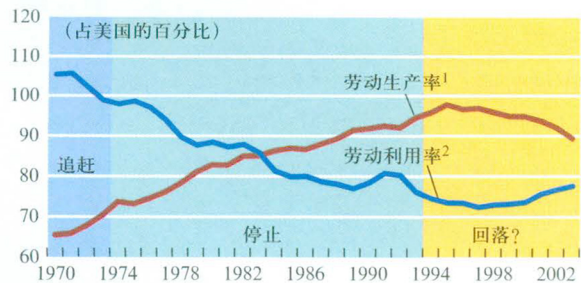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 《世界经济展望》，2004年9月。
¹依据剩下的计算 (排除全球差异)。
²基于欧洲中央银行的数据，其中不包括欧元区各国之间的贸易。

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元区人均收入的增长就略微低于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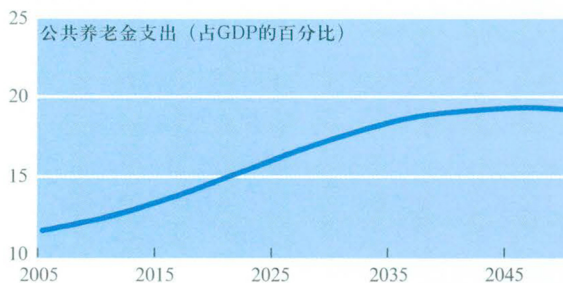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OECD和IMF员工的估计。
¹以2003年的购买力平价 (PPP) 值计算。

为追赶美国的人均收入，更多的人必须加入欧元区的劳动力大军



资料来源：OECD和IMF员工的估计。
¹以2003年的购买力平价 (PPP) 值计算的每小时的产量。
²人均工作的总的小时数。

欧元区居民也将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以支付其退休费用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估计。
注：假定除了老年人抚养率，所有养老金体系的系数都将在当前水平保持不变。

依据规则与相机抉择

在解决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度应该降低吗？

Raghuram Rajan

对于外行来说，有一种想法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即政策制定者将自己绑定在规则中要比身由决策好得多。毕竟，要预测环境的变化进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要将政策制定者与规则绑在一起？由于这些规则预先涵盖各种各样的情形，因此在碰到具体情况的时候会不会表现出不足？

每个人都知道腐败贪官所做出的抉择是有问题的。不过，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挪威）基德兰德与（美国）普雷斯科特之所以获得这个奖项，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揭示了即使是善意的政策制定者最好也遵守规则。假定一国政府期望低通货膨胀与高产出，然而突然的通货膨胀可能导致更高的产出（一段时间内商人会被误导，认为他们产品真的有了更多的需求，尽管只政府印了更多的货币）。同样，假定我们正临近大选，高产出将特别有助于执政党的获胜。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当局将试图制造少量的突发性通货膨胀从而得到及时的产量增长。不过，公众将会理性地认识到这种企图，并将其作为其工资需求的一部分（商人将不会被误导）。现在，如果政府不制造通货膨胀，实际工资将太高，产出将受到伤害。其结果是，政府被迫制造更高的通货膨胀，没有人会被欺骗，而产出也不会增加。通过各种方式，这一很好的理论使得许多中央银行通过通货膨胀与价格水平目标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这一理论在其他地方适用吗？IMF的应急信贷又是怎样的？相机抉择的情况也很类似。从理论上讲，IMF在一国遭受流动性短缺并保证采取正确的政策

行动时，应予以贷款。如果该国是从根本上无力偿债，IMF应令其调整债务。考虑到在事实面前很难将流动性问题与偿付能力区别开来，似乎很明显，IMF应该作出抉择，从而决定将钱贷给谁、贷出多少及借贷附带的制约条件。不过，存在有关合理的规则吗？

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没有规则将很难进行选择。如果即使在危机中，也很难将流动性问题与偿付能力问题区分开，那么那些善意的IMF官员（及其主要股东）就有可能因为偏见进而进行干涉，仅仅因为政治上很难后退，从而让一个国家崩溃，即使这种危机是由该国自己引起的。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当存在一国政治制度的脆弱性及其危机将要扩散到他国的威胁时，才能给予干涉以正当的理由。

相机抉择的困难

随着市场变得对一国金融越来越重要，实施相机抉择的难度也将增加。市场试图预见IMF的行为。如果在危机来临时，IMF像狮身人面一样沉默——不揭示危机到来与否，只让人知道它将根据情况进行抉择——市场将会对其施压。如果市场参与者相信IMF将参与此事，而它却没有这样做，它将被起诉加速危机的发生并扰乱市场。如果IMF已经偏向于干涉了，市场通过预期将加强这一行为，就像Kydland-Prescott的模型中，工资压力使得不受欢迎的较高通货膨胀降临在政策制定者身上。

过度干预的代价是什么？其一，已经通过谈判来降低其无法承受的债务的



Raghuram Rajan, IMF 研究部主任及经济顾问。

国家，会将援助的成本也加到债务中来，其中包括银行系统的成本。该国将在动荡中渡过好几年，然后进入一场新的危机。同时，公众由于低经济增长以及高税率而付出代价。其二，道德风险行为受到了激励——不仅是投资者逐渐自满（这方面的现象非常繁杂）或政府过度举债等传统版本，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国内利益集团如果知道该国将不会因此跌落悬崖，可能就会没什么动力在通货膨胀预算、过多的工资需求或效率低的垄断方面妥协。问题在于，正如Kydland-Prescott可能会争辩的，相机抉择远远不能减轻由国家所造成的整体预期的痛苦，反而会加强其痛苦。

当一国将承受长期的痛苦，而只能被提供减轻短期痛苦的帮助时，为什么该国会同意进行援助呢？谚语“饥不择食”（any port in a storm）可能正是对其的解释。不过，我在IMF研究部的同事，Olivier Jeanne与Jeromin Zettelmeyer则提议采取其他的方法。紧急融资可以帮助政府将危机的负担从国内商业精英的肩上卸下，转移到国内纳税人身上。由于后者缺乏强大的影响力，由他们承受过度干预的冲击，那些拥有影响力的人都将赞同。

使用更多的规则

Kydland-Prescott的理论揭示了什么？当然是规则。IMF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拥有适当的规则，譬如那些特殊准入的规则。不过，如果规则更多，那么情况会更好吗？例如，根据Jeanne与Zettelmeyer的建议，IMF对一国的借贷必须将该国平时的政策与改革考虑进去。如果一国采取健全的政策并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将存在这样一个假定，即如果它面临一场危机，则有可能是流动性危机或偿付能力危机（譬如一次持久的贸易冲击）。这种危机并不是由其自己造成的。IMF将对前者进行干预，在后者中则提供保险——IMF的资源将不会被完全滥用。

这些附加的借贷限制将被写入正式的年度《文本IV》咨询中，在那里它们将以该国政策的深入分析为基础。由于一国的政策环境变化很大，临时的评估也有可能被采取。这种评估在有关IMF对一国政策的看法的市场上，将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在IMF正规的项目之外，对该国施加稳定的压力令其停留在改革的阶段（有效的话，将是一个“无借贷”项目），并给IMF的工作人员施加更多的压力，使其做好分析，因为不

充分的评估将会受到质疑。

过度限制？

紧接着两个关注焦点出现了。首先，如果IMF要成功地干预一场流动性危机，它通常要注入足够的资金以停止这场恐慌。资金太少将无法完成这项工作，而准入的限制如果设定得过低，有可能会抑制成功的干预。尽管IMF的工作人员可能不能判断一场危机是流动性的或偿付能力的，但是他们却肯定能从危机的各种事实中判断出需要多少资金。那么这些规则是不是没有过度限制？

答案当然是。不过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而言，由于准入限制被认为约束性太强，IMF将不得不使双边或私人团体信服并加入，这样做将限制过度的干预。否则，IMF将不得不出局。因此，准入限制将有效地转化成一种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将干预的可能性（而不是援助的数量）与国家平时的政策与改革联系起来。譬如，对那些平时表现较好的国家，进行援助的决定可能只需要通过IMF执行董事会少数人的同意即可，而那些平时表现较差的国家，则可能需要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政治上独立的少数成员国，可能会对那些没有政策自主权国家的借贷进行阻碍。

太具侵略性？

不过，这引导我们注意第二个关注点。预先设定的这些限制性条款是有效的，如果将与这些限制性条款相关的规则相加，将比当前IMF所做的任何事情更具侵略性——即使是不在项目中的成员国也将必须接受更详细的审查。各成员国将适当关注于IMF工作人员鼓励它们采取的政策类型以及在设定准入限制（或选举要求）时政治干预的可能性。这意味着，IMF的管制将不得不会被所有成员国视为合法。不仅是意见与代表问题需要被解决，董事会的成员也需要从他们的当局获得一定的独立性，从而他们的决定可以建立在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在这一点上他们可能要比千里之外的政府部门了解得更多。

总之，尽管规则真的可以发挥作用，也需要IMF的运作方式有重大的变革。由于没有人真的愿意放弃相机抉择，这一事实加深了这一难题。不过，如果中央银行能这么做，也许这并非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促进 国家 发展

——财政政策的作用

Sanjeev Gupta、Benedict
Clements 和 Gabriela
Inchauste 编

Helping Countries Develop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Editors
Sanjeev Gupta, Benedict Clements, Gabriela Inchaust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渠道推动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的发展。但是,这些渠道如何在发展中国家恰当地发挥作用?发展中国家应当实施何种税收和支出政策才能帮助自身达到千年发展目标?如何能使国际援助更有效率?本书依据相关理论和各国的实践,汇集了IMF针对财政政策所使用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方式的研究。

“对于研究人员以及相关的政策制定者来讲,本书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 Tony Addison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

“对于一系列颇有争议的问题,本书作者提供了新的数据,并针对这些争论重新给予澄清。本书的方法是公正的,其经验研究不仅可信,而且具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对于相关人士来讲,本书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对于那些试图做进一步研究的人士来讲,本书内容就是一个出发点。”

—— Stephen A. O'Connell 斯沃斯莫尔学院

“这批著名学者撰写的这些文章当前在这一领域都处于研究的最前沿;的确这些文章占有很大比例。文章质量都非常高,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极为重要。该论文集也表明了IMF处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灵活性。本书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对于在财政政策为何过去会出现问题以及将来如何更好地管理方面具有浓厚兴趣的人士来讲,本书还是一部重要的读物。”

—— David Bevan 牛津大学

“文章所使用的严谨语言和严格的经验分析,并没有使文中所阐述的重要问题以及时常得出的令人不安的发现变得晦涩。财政纪律对于减少贫困的经济增长是关键的;由外国援助提供的社会支出也经常浪费或者用于腐败,并且治理也非常脆弱;在援助和国内收入筹措之间或许存在一种折衷。”

—— Nancy Birdsall 全球发展中心

如果需要更多的信息,请登陆网站: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nft/2004/HCD/index.htm>.

\$40.00. English. ©2004. xii + 528 pp. paperback
ISBN 1-58906-318-X. Stock#HCDRE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Publication Services
Room CN-235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Tele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Prepaid orders may be mailed, phoned, faxed or e-mailed. Please include AMEX, Visa, or MasterCard number, expiration date, and signature on all orders.



欢迎马上订阅,注明代码,可享受10%的折扣。

代码: HCDR02